

第四册

性与经济正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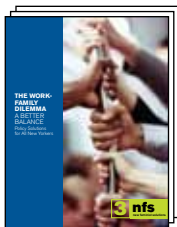
此系列中的其他分册



第一册
回应暴力，重酌安全：
为建立人类安全的政策替代



第二册
女性，工作和学术：回应“后民权时代”的性别歧视



第三册
工作与家庭的两难境地：
更好的平衡

下载任何《新女权主义解答》系列，请访问www.barnard.edu/bcrw 或致电 212.854.2067 获取免费刊物。

致力于性与经济正义的新观念

作者：Kate Bedford女士与Janet R. Jakobsen女士

出版：巴纳德妇女研究中心（Barnard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

近年来，巴纳德妇女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将女权主义的抗争与种族、经济、社会、以及全球正义联系起来。我们已经与那些长期以来为世界更加公正而抗争的学者、社会活动家、以及艺术家建立了非常宝贵的、广泛深入的联系。

本报告根据Josephine Ho女士与Naomi Klein女士在巴纳德学院主讲的维吉尼亚·舍·格尔德斯尼福（Virginia C. Gildersleeve）讲座与研讨会的内容总结而成。所有该研讨会的参与者对我们加深对全球正义的理解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学者、社会活动家、以及艺术家拓展了经济正义与性正义的含义，并将两者有机地联系了起来。该专题研讨会的目的在于阐述性正义与经济正义抗争的联系并拓展关于如何将不同的人群与运动联合起来，齐心协力地创造正义的新观念。本报告结合了参与者在参加研讨会时准备的短小精悍的论文（参见网址：www.barnard.edu/bcrw/justice/index.htm）以及他们在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我们在此诚挚地感谢以下参与者的贡献、智慧、以及慷慨分享：

Radhika Balakrishnan
Kate Bedford
Suzanne Bergeron
Elizabeth Bernstein
Jon Binnie
Ann Cammett
Davina Cooper
Lisa Duggan
Mary Margaret Fonow
Gisela Fosado
Claudia Hinojosa
Josephine Ho
Janet Jakobsen

Kamala Kempadoo
Naomi Klein
Gabrielle Le Roux
Irene León
Njoki Njoroge Njehú
Rhacel Salazar Parreñas
Brooke Grundfest Schoepf
Stephanie Seguino
Svati Shah
Anna Marie Smith
Neferti Tadiar
Ara Wilson

本报告的出版得益于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的慷慨资助。本讲座和与之相关的专题研讨会的开展得益于欧维布鲁克基金会（Overbrook Foundation）与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的重要资助。



性与经济正义

本报告根据2007年秋季在巴尔德学院展开的讨论而成，以下两个关于全球正义的抗争系本报告的核心：在我们的社会 and 生活中保证更强的经济正义的多重努力，以及在我们的社会 and 生活中达到性正义的复杂抗争。具体而言，本报告探讨：我们应当如何把两个经常被完全分离的领域（性与经济正义）联系起来？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最近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变化与性的联系？有哪些可能性——如果该可能性存在——使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表述向替代性的性政治开放，并且相对的，哪些新的性规范和法规被融入了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我们能够从那些致力于为这些正义而抗争的人士那里学到什么，并且，我们能够如何从根本上支持他们的努力？

障碍与主要架构

为了回答那些问题，有必要超越这两个领域在认知上的分离以及与两者各自相关的运动。世界经济正义的当代运动还没有倾向于考虑与他们工作相关的性问题，与此同时，为争取性权利的运动很少强调经济问题。例如，尽管女权主义者为了生育权利和保持身体完整性的权利而进行的抗争为其他在国际层面上组织的运动提供了重要模式，这些运动也许被那些有志于挑战世界经济不平等的人士视为非主流的、或者非物质的抗争。一些投身于生育权利抗争的社会活动家也很难提出经济正义（Balakrishnan）并且/或者女性同性恋性权利（Hinojosa）的问题。同样地，在学术界，关于贫穷、结构调整、以及新自由主义的交流大部分没有涉及性权利、“全球同性恋”身份的暴露、性旅游、非法人口买卖和性工作的研究。该等学术研究的不足甚至在类似非法人口买卖的问题上也存在——非法人口买卖曾经主要

与血汗工厂的劳工问题一起考虑——现在开始逐渐地与性问题同义。

另外一方面，正如我们的一名参与者所提出的：“性正义和经济正义在讨论中并不享有同等合法性。很多关于性的讨论是完全被禁止的，系刑事犯罪”（Ho）。例如，在非洲部分国家和地区，“经济正义的概念被广泛地信奉，”因为“经济正义”这一术语在教堂的领导者、非政府组织、以及地方的、国家的、和跨国的运动中被反复地突出引用。但是，“性正义并不享有同等的‘体面’或者支持”（Njehû）。与此同时，在其他社会圈子，尤其是在美国的学术界，相对于讨论贫穷或者阶级不平等，讨论某些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权利则更容易（Smith）。性与经济正义的区分已经被提出并进一步地通过大量的方式被确立——正如少数与多数政治、社会政治和文化政治、确认与再分配、需求与欲望的区分（Duggan、León、Shah、Wilson）。也许最极端地，其被理解为现实政治——例如战争和经济——与富有的、西方同性恋精英分子之不必要的、非现实的考虑的区分（Binnie）。

这种区分将越来越难维系，并且现在，性与经济的相关性至少在某些地方逐步地得到认可。女权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坚决主张性行为的决定很大程度上受到资源的影响（Hinojosa），并且她们反复地坚持生育权利与性自主的权利都离不开经济正义。因此，我们已经知道，在人与人之间的层面上，经济条件上较之男性处于劣势的女性很难争取更安全的性行为（Seguino、Grundfest Schoepf）。我们也知道，一个性关系连接的选择可能产生深刻的经济后果。例如，在美国，购买健康保险的一条主要途径是将配偶的健康计划考虑其中，因此，性关系的连接也与健康保健相联系。与此同时，在欧洲进行的由4,000多人参与的调研发现，在离异之后，男性的收入平均地增加11%，女性的收入平均地下降17%，使

1. 通过撰文参与专题研讨会的人士的文章可到以下网址参阅：
www.barnard.edu/bcrw/justice/index.htm

离异成为一个很多女权主义者关注的关键的正义问题 (ansen et al. 2007)。

两者的相互联系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也很明显。例如，生育健康服务在世界很多地区已经因为资金短缺而受到破坏性的影响，健康指数在一些地区出现逆转：1990年与2000年期间，在很多国家，从最贫穷的国家（尼加拉瓜、坦桑尼亚、津巴布韦、毛利塔尼亚），到中等富裕国家（巴拿马、俄罗斯），再到最富有的国家（美国和英国），产妇死亡率增加（世界银行2006）。结构性调整措施也已经破坏很多国家的健康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他们应对与日俱增的艾滋病危机的能力（Grundfest Schoepf）。在类似的背景下，专注于与病毒传播相关的性正义问题的艾滋病社会活动家越来越关注全球健康体系改革与世界贸易政策变更的必要性，从而允许获得救生药品（见14页）。这些事例促成了关于经济与性两个领域相交的全球讨论，并且自此之后，社会运动的开展在如何全面争取正义方面积累了重要的经验。

但是，正如很多与会者（例如，Bergeron、Hinojosa、Shah、与Wilson）所指出的，将运动集中起来的一个最主要的障碍系经济与性正义当前架构的方式。一个问题架构的方式对促进参与和争取支持非常关键。架构运动也影响他们与其他运动的潜在联系。我们的与会者就经济与性正义当前的架构如何阻止了社会运动之间的联系提出了担忧，并且他们也提出了架构经济与性正义的替代性方式，从而促成两者的相互联系。

经济正义

当经济正义被援引时意味着什么？该问题尤其重要，因为很多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答案。对自由市场商人与自由论者来说，经济正义的含义系建立在正式权利（诸如私有财产、政府的有限作用、对国际贸易的开放、以及对个人责任持续关注等权利）之上的平等——换言之，受社会活动家所批评的，创造了大量的经济不平等而非经济平等的新自由主义者的政策。

仅仅致力于自由市场所定义的经济正义已经受到旨在连接正义与平等，以争取全人类幸福的运动的反对。一些此类运动已经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框架下开展，旨在发

展较之新自由主义更好的、为人类服务的资本形式。该等理论中最为著名的一个是，由经济学家Amartya Sen提出，并通过诸如联合国人权发展报告等联合国项目所制度化，连接人类幸福与能力的概念（Sen 1999）。正如联合国所述之定义：“发展系……拓展人类的选择以引向他们所价值认同的生活。因此，发展不只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仅仅是扩大人类选择的重要方式中的一种。扩大这些选择的基础系人类能力的建立——人类能够在其生活中所做的或者所成就的事情的范围。人类发展最基本的能力是能够健康长寿的生活，知识渊博，有能力获得必要的资源以体面生活，并且能够参与社区的生活”（联合国发展项目2005）。

能力理论的支持者主张政府应当扮演斡旋的角色，致力于解决自由市场不能提供的幸福问题——包括发展政治以保证社会安全网并减少未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衍生的异常情况。该等政治应当包括对金融资本流动性的控制，由政府提供健康保健、幼儿护理、和教育，适用累进税率以限制收入的不平等，为退休和残疾设立社会安全保险，以及鼓励平等就业的经济政策。就此而言，政府的作用被定义为，不仅仅是提供商品与服务，而是平衡不受管制的资本。因为新自由主义仅仅提倡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观念，急迫地威胁着为人类所需的社会资源的供给，所以，很多当今政治辩论强调为保护、恢复、或者制定基本的政府供给而努力。

这些都是重要的奋斗目标和问题，但是，也存在一整套社会活动家项目与社会运动，致力于改变经济生活的结构，从而使再分配与保持人类与利润的平衡不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在未受管制的自由市场商人与更进步的资本家之间的斗争能够导致更加深刻的经济变更。对于有志于后者的社会活动家与运动，经济正义意味着一系列经济部署，不会在一开始就使社会的大部分领域处于劣势——从而要求政府尽力弥补。在一定程度上，公正的经济部署被理解为是施惠于全人类和全世界的。为追求经济正义的替代可能性，我们需要再一次质问，经济意味着什么？经济如何帮助人类创造人生价值、以及不仅提供愉悦，而且使工作也充满快乐的生活？这些是重要的辩论甚至争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提供了与性正义的潜在联系。

核心术语 新自由主义

我们理解的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已经引起全球社会活动家回应的经济的、政治的、与文化的转变。作为一套宏观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把自由市场增长模型放在了优先地位，该模型依靠减少法规、自由贸易、私有化，以及节省国家提供的社会服务。这些政策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它们激化了穷人们致力于日常生存的斗争并增加了世界上大多数人群的不安全感。

例如，新自由主义已经导致了使工作日益不稳定的广泛的经济改变，包括非精密加工的生产性工作机会减少，增加了服务行业的工作，侧重于劳工市场灵活性与“及时”生产方法（通过该方法，商业试图更加迅速地回应市场压力）的新经济模式，以及增加分包与自我雇用（Fudge and Owens 2006, 7）。这些改变反过来已经导致以临时合同与非定期的工作的方式从事不稳定工作的人的数量增加。其结果是，不稳定工作的问题现在是很多大型的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问题（Vosko 2006）。

但是，我们强调新自由主义以及其所导致的不稳定性不仅仅是与经济及劳工相关的变化。实施新自由主义依赖于不同形式的政治策略。对于那些研究智利Pinochet将军实施新自由主义的经历的人士而言，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与军事独裁和压制紧密相关（Klein 2007）。而且，贯穿20世纪80年代，多边发展机构建议负债国家实施自由市场政策，使用大量的条件以掌控经济政策所要求的方法。1989年，平均56个条件附属于结构性调整贷款，而且有的超过100个条件（van Dijk 1998, 113）。因此，很多世界南方的新自由主义伴随着减少国家主权并试图使经济政策与公众参与和辩论绝缘。由于该等原因，“新自由主义”这一术语引起相当多的社会活动家的注意并有能力动员抵抗，正如如其被很多社会运动所使用的一样。

增加关注于使个人负责管理他们的生活并掌控他们的行为，以使其适应于具有另外一个新自由主义核心特征的市场。在这方面，

企业家与关注个人责任系与此术语相关的核心政治策略（Rose 1999）。

但是，最近转移到使自由市场模式更加稳定和全面 — 它们自己也因全球抵制与危机而进行改进 — 已经导致了关于新自由主义正在采取的政治模式的新问题。随着非政府组织日益强烈地呼吁通过反贫困项目，帮助资本主义的社会管理并努力保障可持续性发展，新自由主义是否进入了调整型阶段，运用不同的政治技巧并采取不同的、明显更友善的权利架构？或者，自由市场模式是否比以前更加野蛮，依靠于Naomi Klein所定义的涉及与致力于为跨国公司赚取更大量的利润相关的全面战争、经济危机、与心理恐怖的多方面“震惊主义”？这些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未回答的问题 — Klein所称的完成状态转变的一种形式 — 不仅转变关于世界秩序的现状之学术交流，而且也帮助确定学术家与政府和多边领导者交战的术语。

性正义

正如上述所罗列的不同的经济正义的观念，在当今世界，也存在不同的性政治与正义的观念。Lisa Duggan 罗列了两个最主要的观念：（1）由性法规所规范的保守的性政治，其包括很多在“家庭价值”名义下所提倡的政治。该等政治包括限制资助生育健康、重申异性恋婚姻的制度化或者将同性性行为定为刑事犯罪的病态政治，缩减性教育经费，以及限制艾滋病防疫工作；（2）关注于“女性权利”和“同性恋权利”的性平等的自由政治，通常包括，为同性婚姻的权利而抗争以及在理解此权利基础上而开展的性自由的运动。除了基本的政治权利，平等运动有时候也促进经济自由，包括“同性恋旅游业”或商业性行为的权利。正如Duggan所指出的，这些在权利基础上所建立的模式倾向于将性自由与其他问题（包括经济正义）相分离，同时也因为其是从种族与国家政治的角度提出的，因此，性权利可能以融入了

当代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方式而被提倡。举例来说，就“同性恋旅游业”这一问题，致力于“同性恋权利”的国际抗争经常是由于来自于工业化国家的白种男性和女性同性恋争取到世界其他地区（像加勒比海地区）旅游的权益而引起的。（加勒比海地区经济被全球北方国家²所控制）。

尽管由法规主导的性政治与由平等主导的性政治有明显的区别，这两个模式都能够很好地融入新自由主义，因此，它们有时候也被视为一块硬币的正反面。尤其是，正如Josephine Ho所说，法规和平等之间的斗争操控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同方面，同时打破了传统的社会关系，并依赖于合理规制的社会关系而存在。这就意味着，有时，当资本主义打破对性的控制时，随着这些转移与开放，相应的规范重新定制工作也将随之而来。例

2. 参见 Puar (2001), Alexander (2005), Kempadoo (2004)。

如，尽管台湾的年轻人较之他们父母的传统权威更加独立，但是他们也受制于新模式的管控，尤其是与诸如网络等新科技相关的管控。

为理解这些复杂性以及它们施加于社会运动的矛盾压力，社会活动家与学者提出了一个几个世纪以来只有简单答案的问题：资本主义是压制了性还是解放了性？我们参与者的一致意见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必要超越“非此即彼”的答案，应当对“既此又彼”的答案进行考察研究 — 考量当代模式的世界资本主义拓展替代性的性政治以及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秩序，以及树立新的性规范和法规的可能性。例如，Radhika Balakrishnan主张，资本主义对妇女的影响有可能既是解放又是剥削，通过给予她们更多的自主权并同时使她们受制于性的客体化。Ara Wilson对曼谷的购物中心对培养性表达（包括异性恋夫妇与女同性恋之间的性表达）与增强建立在消费基础上的经济市民之职责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Wilson 2004, 132）。同样地，正如Stephanie Seguino所指出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可能采取“非此即彼”的答案的原因之一恰好是因为性与经济一样具有多面性。“性”这一术语可以包含性表达、愉悦、身体完整性、与生育权和保健等众多的元素。“因此，新自由主义可能从正面减弱了对性表达与愉悦的压制的同时，也削弱了国家的作用，从而导致女性的收入低于男性的收入，减少了妇女获得生育保健的机会，并限制了她们在性关系中的谈判权利。”³ 法规和平等之间的选择限制了对于这些矛盾动态发展的分析。

加强对此问题的分析要求我们超越一些传统的左翼分子所持的对性爱的恐惧以及对同性恋的憎恶（Binnie）。但是，它也要求我们更好地理解与资本主义相关的（但无论如何并不被资本主义所包括的）多种形式的愉悦 — 例如，考量Balakrishnan在研究中所提出的“微观 — 愉悦”这一术语，以及女性消费者可能经历的有权利满足其欲望并获得令她们满意的产品的方式。事实上，与会者就与此相关的商业贸易进行了诚恳的讨论，

并认为某些批判性消费才是问题所在（Grundfest Schoepf），并且其他与会者也质疑，消费的发展能够提供关键性的经验教训？还是可能成为那些对性和市场感兴趣的人士的易犯罪空间（Balakrishnan, Wilson）？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关于性公正的观念必须包含愉悦和欲望的空间，并且必须因此掌握如何在它们当今的商业化状态中重新定义该术语。⁴

性与资本主义关系一样复杂的是性与政府的关系。性公正可能要求政府为提升人类能力而工作。例如，来自政府的制度化的支持对于允许性表达自由的经济、健康具有必要性。但是，政府的法规同样可能成为自由的障碍。因此，正如与性正义相关的商品化的争论一样，与会者就政府在促进性正义方面的作用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一些与会者主张，政府的作用是反复倾向于管制的问题，以及Michel Foucault（1991）所称的“治理性”。其他与会者主张，政府在提供为实现性正义所需的社会与经济资源以及机会方面扮演了关键性的作用。当把性与经济正义放在一起讨论时，复杂性只会增加。一些对经济正义感兴趣的组织可能诉请政府成为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堡垒，但同时仍然因为保有对政府作为规范性法规的制定者的批判性观点而与之抗争（Shah）。

因为这些与资本主义和政府有关的复杂性，我们希望找到除了在法规与平等之间，以及在自由市场与诉请政府成为规范性行为的辩护者之间做徒劳无功往返之外的一种方式。我们的项目旨在寻求性正义的第三种观念，从而延伸与市场，尤其是与新自由主义相吻合的权利的狭窄观念，并假定政府在保障那些狭窄的权利方面发挥有限的作用。总而言之，我们所感兴趣的性正义观念是在挑战对性权利的否定之同时挑战经济不公正。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经济与性的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3. 关于全球化对性的影响之一一个类似的分析，参见致力于性与生育权的全美协定的运动（2006）。

4. 参见发展研究院的性机构的工作，该工作已经突出了将愉悦融入解决性问题的全球发展努力中去。

核心术语 规范活动

学者与社会活动家已经发展了“规范活动”的概念，作为一种理解社会或政治权力与道德规范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方法。现代关于性别与性的公众担忧把与男女性别互补、一夫一妻制、和基本家庭（只包括父母和子女的家庭）相关的道德规范与大量的社会政策和法规（包括从健康保健到移民再到结构调整的社会政策和法规）联系起来。那些不适应于性别与性的规范性模型的人士可能不能够获得大量的社会与政府福利（从跨越国境的权利到在工作场所被尊重地对待的权利）。这些规范性结构使变性人与性少数派尤其容易遭遇社会边缘化与经济剥夺。

致力于性规范活动概念的学者最开始专注于同性恋规范活动——帮助规范化异性恋性行为的主要模式并将其树立为普及的、道德正派的模范的机构、结构、与实践（Berlant and Warner 1998, 548）。这些包括明显的制度，如政府限制婚姻为异性性行为，非显而易见但普遍存在的实践，如电视剧、电影、和小说的浪漫故事情节或一个人关系的持续主题在于是否其“已婚”。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除了伤害那些性少数派，使其被排除在考虑之中，异性恋规范活动还以迫使其生活更艰难的方式规制异性恋人们

的生活。例如，“性倾向为同性恋”的人士在一夫一妻制中不遵守终身相守的理想状态，也许发现他们在接受社会福利和退休金的领取方面处于劣势；那些在规范化的生活伴侣外养育子女的人士也许面临惩罚；那些不希望或者不能生育的人士也许被指责为无价值的或者无耻的。规范活动创造了一个把一些能够被社会所接纳的人士包括在“不轻易吸收外人加入的小圈子”而排除其他人进入该圈子的社会（Rubin 1993 [1984], 13）——是否他们被排除在圈子之外在于他们非规范的异性恋性行为方式或者他们是同性恋或变性人。

现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男女同性恋人群能够被放到规范化模式中并劝导他们重塑自己，创造其以规范化的异性婚姻夫妇的模式生活的印象，从而期待获得规范化的同性恋者所享有的权益。那些新近地被纳入“不轻易吸收外人加入的小圈子”的人士必须管制他们自己的活动，从而不会迈出该圈子的边界线。正如 Jon Binnie 所指出的，在此背景下，使非规范化的人群规范化是一件越来越复杂的事情。性与色情扮演了核心角色。他注释道：“应当区分那些富裕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从事创造性的旅游经济之职业工

作的同性恋与那些‘不受欢迎的古怪的’、其生活方式不够文雅的、并不能融入城市重建策略的故事中的同性恋……在表述经济与性正义的新观念时，我们需要认识到色情与性本身在表达那些其身体被视为重要的人士与那些其身体被视为不具价值的人士之间的区别时的重要性。”

性别与性规范活动也与其他形式的规范法规（包括那些种族与宗教的规范法规）相联系。其结果是，诸如美国的福利改革的政策能够围绕性偏离的青少年母亲与妇女为主的家庭的观念展开，作为实施（而不需要提及）深刻的种族化的经济政策的一种方式（Smith）。相似的，在国际政策中，对于政治家来说，很可能援用性模式的不同性作为一项国家不同的核心标志。例如，这就建立了一个动态世界，在其间，西方政府可能运用它们所描述的在一些国家缺乏性解放的事实作为一项社会失败的指数，但是，是一项区分它们与“西方”的核心特征。换言之，规范活动是一个调整性的模型，运行于性别、人种、阶级、宗教、种族划分、和国家的区分点之间。

新连接点

我们在讨论如何把性与经济正义这两个主题连接起来的过程中，有时候问题看起来非常简单和直接，但是在其他时候，对我们而言，保留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被证明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本次研讨会旨在建立两者之间的联系。正如一名与会者指出的，“我们应当意识到解决这种不公正的一些困难，[比如]，在专题讨论会上，‘性正义’经常以过于简单的方式出现，变成生育权以及作为女性的身份的讨论……”（Wilson）。另外一名与会者提出：“我仍然认为，较之讨论性行为，我们在讨论性压抑时更活跃，我希望我们自己能够突破自我”（Cammett）。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诚实地面对“更好地思考这些结合点和冲突点的问题”（Wilson）。

尽管如此，所有与会者都非常明确的是，经济与性两者之间存在交叉重叠并相辅相成。在提及“相辅相成”这一术语时，学者与社会活动家所指的是，经济关系对于性关系的形成非常关键，甚而言之，性关系在经济关系中、并通过经济关系而建立。当然，性关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直接经济性，例如，结婚既是一项经济事务，又是一件浪漫的事（Hinojosa），又或者例如 Kamala Kempadoo 以及其他与会者所提到的“性交易”的事例。⁵很多时候，我们的讨论集中于这些直接的、非常显著的交叉点，因为在该类事例中，经济如何影响性以及性如何影响经济都非常清晰。

但是，与会者也鼓励我们超越思考这些直接的连接点，并询问，性行为如何能够帮助组成经济关系以及经济考量如何可以形成我们所期待的性关系。在本章节中，我们罗列了四个潜在的经济与性正义之间的连接点。

连接点一：社会再生产与亲密劳动

几位与会者主张，长期以来旗帜鲜明地致力于社会再生产的女权主义存在与性相连接的巨大潜力（Bergeron、Bernstein、Duggan、Tadiar）。社会再生产是指，做工作不在于生产经济产品，而在于再生产一个人类可以进行劳作生产并消费这些产品的社会。它包括生物学的再生产、劳动力的再生产、以及与保健、社会化和与实现人类需要相关的社会实践（Bakker and Gill 2003）。幼儿保健、家务劳动、少有余粮的农场经营、做饭、为支持社区组织的自愿工作、付费的家庭劳工、以及性工作都是此类劳动的实例。⁶

考量社会再生产以及它所关注的亲密关系是我们理解市场如何长期保持稳定的关键因素。但是，因为社会再生产的劳动经常是无偿地由女性来承担，并且因为其生产的是人类和社会关系而不是商品，它经常被视为具有非生产性，即，很多女权主义者所提出的对妇女工作的系统性折扣。⁷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已经特别批评新自由主义的重整措施，因为其没有足够重视社会再生产的要求。事实上，新自由主义重整措施的一个关键结果是，由于缺乏人本位*的相关政策，妇女被迫进入付费劳工市场而造成妇女负担过重。她们的工作日被延长，并且她们被期待从事额外的照顾性劳动以弥补因为政府节省开支而造成的不足。另外，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将重新私有化的责任施加于妇女身上（Brodie 1994, 48），因为其假定妇女的时间是“无限地、具有弹性的（此乃经济学家 Diane Elson 非常精辟的比喻）”（Elson 1996, 71）。

6. 参见 Glenn (1992), Gill (1994), 和 Bernstein (2001)。

7. 参见 Perkins-Gilman (1970 [1898]), Waring (1988), Folbre (1994), Sen and Grown (1987), PrDgl (2002), Peterson (2002), 和 Rittich (2002)。

8. 参见 Sparr (1994), Moser (1993), Brodie (1994), Bener í a and Feldman (1992), Baaker (1994), Le ó n (2005), 和 Lind (2005)。

5. “性交易”既包括传统的“性工作”，也包括“经常由年轻女性提供的、故意的性交换活动，以一些‘改良’的形式—如物质商品、衣服、学费、住宿、饮食、社会地位等（Kempadoo）”。

经济关系依赖于社会再生产的含义是，经济由大量的构成社会生活的亲密关系（包括性关系）组成。在这里，一个关键点是，经济深刻地改变了人类从事亲密劳动的方式，包括亲密劳动中所发生的性关系。在很多国家，因为医院营业时间缩短并且保险公司拒绝支付许多由医疗机构提供的保健服务，之前由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在医院所从事的体力劳动已经转移给家庭或者其他私人保健服务人员。由于个人或者家庭承担了这些医疗保健的负担，不同形式的私人体力劳动市场得到蓬勃发展。老人保健、幼儿保健、以及家务劳动都越来越多地进入付费劳工市场。付费劳工的范例正从工厂转向家庭，与此同时，上下班的概念也从固定的小时制转向无限的个人化的任务制。

劳工市场的这些变化与性关系具有深刻联系。来自全球南方的妇女可能移民，为全球北方妇女的家庭成员提供保健服务，这代表了一种复杂的重新定义“家庭”和亲密联系的趋势（Parreñas）。而且，反思现在已经进入付费劳工领域的不同形式的亲密劳动，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更广义地思考性商业与劳动力。我们需要进一步询问：什么可以把性商业与涉及个人保健或者乃至可以形成其他家庭劳动模式的极端亲密的身体劳动区分开来？

反之，此类关于劳动亲密形式的分析改变了我们对劳动本身含义的理解。传统的劳动已经很难解释家庭劳动与关怀劳动，以及支撑该等劳动的性假设，然而，世界很多地方的劳动市场正转向此类关怀劳动。理解这些联系能够重新建立解决劳动问题的方式，而劳动问题正是经济正义的核心所在。⁹

而且，由于政府节省部分开支，家庭现在成为社会供给的关键因素，对于家庭解体以及非正常血缘关系的担忧能够产生与如何保证关怀劳动的供给相关的恐慌。在此背景下，新自由主义政府越来越多地提出指导性意见，要求家庭与社区提供基础性服务并提高有所减速的社会再生产。尤其是，通过美国福利改革（Hardisty 2008）或者通过旨在巩固家庭关系的发展项目（Bedford

forthcoming），穷人成为大量旨在介绍并强制实施异性恋的活动的目标。在此类项目中，婚姻、或者至少一夫一妻的伴侣关系，经常被确定为最终反贫穷的策略，就像规范的性生活可以使人们摆脱贫困一样（Mink 1998）。事实上，在讨论“新自由主义实际包含性政治”

（Duggan 2002, 117）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已经批评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地干涉家庭，以确保社会再生产的企图（Richardson 2005）。

在实施利用家庭作为减少贫困的一项措施的同时，传统的家庭结构却因为经济压力与日益增加的经济不确定性而受到破坏。一些社会运动可能因此而集结起来，在上述两者的基础上为家庭而辩护。它们可能动员工薪家庭，或者要求平等婚姻权，从而使处于同性关系的个人，在将其个人权益依赖于其有工作的生活伴侣身上的时候，能够获得健康保险。事实上，一些政府已经通过允许以前被排除的同性恋少数派¹⁰结婚的方式，而不是传统地反对同性恋少数派的方式，来应对社会不稳定。尽管这些胜利系为平等而抗争的结果，我们不能认为这与私人化社会再生产劳动对成年夫妇组成的家庭所造成的压力完全无关。

而且，家庭一方面可以团结起来成为抵抗、排除和边缘化人群的据点，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成为权力、暴力、“犯罪者与问题”、以及性法规的据点（Wilson、Hinojosa）。因此，强制人们依赖“他们的家庭”作为维生之道可能严重地危害那些不墨守成规并企图增大在家庭中已占主导地位角色的权力的人士。为了更好地说明社会再生产工作与性工作之间的联系，我们更有兴趣质疑，而不是倡导——经济生存应当要求特殊类型的亲密联系——的观点。

这些复杂的联系对旨在建立广义的经济与性正义的新观念的社会运动提出了重要问题。其核心问题包括：我们作为正义的倡导者，在关注新自由主义运动时，应当采取哪种社会再生产的特殊形式？新自由主义运动如何定义性？以及新自由主义运动与性正义的抗争是否吻

9. 参见2007年由Eileen Boris和Rhacel Salazar Parreñas组织的关于亲密劳工的会议，其网址为：www.ihc.ucsb.edu/intimatelabors。

10. 参见Oswin (2007), Conaghan and Grabham (2007), Barker (2006), Young and Boyd (2006)。

合？相反，哪种模式的社会再生产是我们所为之辩护的？并且建立在哪个基础之上进行辩护？我们在为之辩护的模式中对性、爱情、以及亲密的假设是什么？为什么亲密附属应当成为获得经济正义的要求？我们认为怎样的关怀劳动才应当由我们的爱人免费提供，并且什么样的关怀劳动应当付费？我们应当如何使那些出于爱心的人士免于精疲力尽？我们应当怎样改革，使每个人都有权享有关怀而不是仰赖于亲密关系（即关怀劳动的接受者被期许着付出个人的所谓感激）？我们应当如何超越把婚姻作为一项脱贫政策的观念？¹¹ 这些问题确切地存在于性与经济正义的交界处，并且正如几位与会者所注意到的，在过去的日子里，它们是我们交流和抗争的核心问题。

连接点二：不稳定、性与经济正义

即使新自由主义使个人和他们的家庭越来越多地承担社会供给的责任，其同时也使很多人的生活越来越不稳定。因此，新自由主义减少传统的的社会安全网络——由政府提供纯供给——会增加市场的不稳定性。不稳定不仅触及社会的很多方面，也因为诸如性别、人种、以及种族划分等原因所造成的地方和社会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变数。例如，女权主义者早已提出，正如女性越来越多地担任兼职家庭劳工、性工作者、以及关怀劳动者这一事实所证明的一样，不稳定工作的崛起与增多因性别而异 (Fudge and Owens 2006; Vosko 2006; Precarias a la Deriva 2004)。意大利女权主义者 Laura Fontane 主张：“女性的不稳定性可以被视作跨越‘差异’之对话的一个富有成效的出发点，从而同时解决性别与生育、移民、工作以及社会福利的问题” (Fontane 2007, 5)。

不稳定性也是形成连接点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它能够更广泛地预示，在持续不断地获得体面生活所需的资源方面，存在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因此，害怕生病、老年时的不安全感、放任与被迫违法、搬迁、以及食物、燃料、水、交通、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之价格上涨都来源于不稳定性。

不稳定性一个更广泛的定义能够把不同的抗争联系起来，并能够帮助我们思考经济重整对人们生活所造成的改变，它也对避免同类化的断言（即，所有的人在当今的经济政策下都面临不稳定性）起到重要作用。正如专注于此领域的一个女权主义者社团所注意到的：“一个自由职业的设计师与一名性工作者有相同之处——工作的不可预见性与暴露性，工作与生活的连续性，以及运用一整套难以量化的技巧和知识。但是，社会公认度与柔弱程度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 (Precarias de la Deriva 2004, 158)。认识到这些区别与相似之处、以及建立联盟的基础，对我们而言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这些辩论之所以与我们相关，因为不稳定的状态与性以多种方式相联系。最明显的是，非规范的个人与社区具有极大的贫困的风险。不管是被赶出家门的同性恋年轻人，面临有限的职业机会的变性人，被解雇的男女同性恋、还是在抚养孩子方面得到很少支持的单身母亲，远离传统可接受的性别与性的模式使人们在性与经济正义两方面直接经受风险。为什么那些不遵从或者不能遵从特定性模式的人应当面临该等权利的剥夺呢？

而且，规范性行为也可能导致不稳定，特别对女性而言。女性可能屈从于压力，因为经济原因而结婚，并且她们可能因为经济生存而被婚姻锁住，尤其是她们为了照料家庭成员而退出了劳工市场。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她们离婚，她们将变得穷困无助，但是，即使她们不与她们规范的性安排决裂，也会陷于危险。在那些具有最高长寿指数的国家，一般而言，女性的寿命比男性长5至8年；该差距在具有最短寿命指数的国家系0至3年

(世界卫生组织 2007)。在全世界范围内，1.82亿男性超过65岁，2.37亿女性超过65岁；900万男性超过85岁并且1900万女性超过85岁 (世界卫生组织 2003)。坦率地讲，即使丈夫与妻子保持互相忠诚，规范地生活，女性仍然更可能面临不稳定的、孤独的晚年。

这些事例证明了性与经济正义的讨论必须超越家庭浪漫和消除不平等，并同时研究抵制和遵从规范模式的性行为两种方式所导致的不稳定状态。性与经济正义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分析不仅仅是与这里所理解的“常规的嫌疑人士”（同性恋年轻人、性工作者等）相关，而且应

11. 参见“超越婚姻”运动，其网址为：www.beyondmarriage.org。

当进入所有理性架构的核心，对替代性的关系提供支持——不论是年轻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这对性和经济正义两者都很关键。

连接点三：界面、连接、流动

Jon Binnie 与 Josephine Ho 提出了非常有帮助的界面问题来思考性与正义问题之间的关系，这个很多与会者都关注的问题（Duggan、Wilson、Parreñas、Cooper、Shah）。Binnie 鼓励我们不只是思考经济交易在不同界面上——家庭、邻居、城市、国家、国际——流动的方式，也需考虑这些不同的空间界面塑造的可能性。例如，城市如何塑造的可能性，或者不同的地区如何创造不同形式的相互作用与关系？这些问题允许我们不仅连接了性与经济政治，也把它们放置在特殊的物质层面与地点上。

尤其是，性经常被认为是最私密的问题，然而，性政治在国际和国内层面上也都有所展现。事实上，几位与会者已经注意到性政治可以被政府利用为应对世界经济力量的一种方法。因为日常生存已经变得越来越不牢靠，并且因为新自由主义承诺繁荣将超越所有层次的社会退步，一些国家已经目睹了把弱势群体作为替罪羊，以经济耻辱的名义再次强烈主张民族主义的社会潮流。在传统的民族主义者的宣言中，非规范的性行为已经被视为威胁（Binnie）。例如，“在波兰，存在一个新的政见，即，讨论经济休克疗法已经使国家蒙受耻辱；所以他们需要重新找回民族主义骄傲。并且民族主义骄傲的一部分是打击男女同性恋、攻击妇女、攻击移民”（Klein）。另外，在台湾，其中一种民族主义骄傲的宣言以世界不允许把使用控诉性偏离作为一种重新聚焦台湾状态的方式为由，怪责于那些在台湾的、其性行为不拘规范模式的人士（Ho）。

在其他背景下，性是国家试图增强全球竞争力的比较优势，比如说，旅游业已经被全球南方的许多国家定位为增加外汇储备的一项核心战略，并且多边发展的领导者已经积极地提倡把旅游业作为一种资本化许多贫穷国家的比较优势（“未受破坏”的海滩、廉价的劳工、生态多元化等）的方式。但是，旅游业是一项性化和种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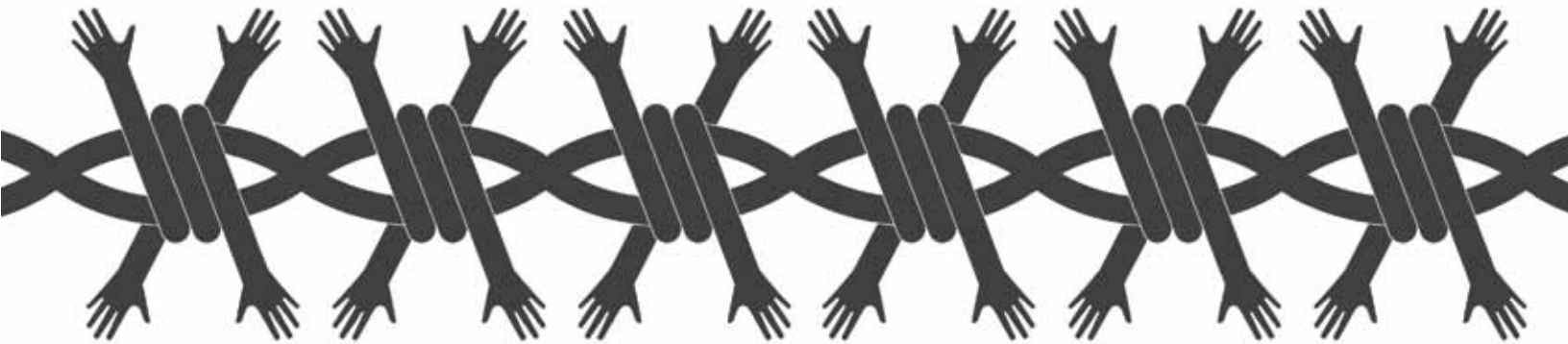
化的事业（Kempadoo）。近距离地接触异域的身体与性想象的诱惑系旅游吸引人的一部分原因，并且这种被性化的发展策略能够建立在种族、性别、与国籍的不平等之上并强化此类不平等。

国际旅游也可能对国内性空间带来复杂的、不平均的影响。例如，泰国的抵抗艾滋病社会运动因政府害怕其会对泰国的旅游业造成不良影响而深受管制——担心影响全球消费者把泰国视为旅游胜地的信心的顾虑超过了地方社会活动家所提出的关于艾滋病的顾虑。在其他实例中，城市推进吸引国际男女同性恋旅游业的努力已经导致地方对空间权的丧失（Binnie），从而强化了地方社会活动家争取正义所面临的困难。

就像国家能够把性作为谈判世界经济复杂性的方法一样，世界经济也能够体现在地方层面上，如社区和家庭。在纽约，一群同性恋青年与变性年轻人（主要系有色人群，由代号为“凶猛！”的组织领导并且他们长期聚集在切尔西区域的汉德森河畔的码头），与为改善码头并限制公众靠近码头时间的纽约市政府之间的斗争正在上演。这些改善代表了日益富有的临近居民的利益。接连发生的冲突可以被视作一项极端的地方斗争，因为大部分政府行为和与之相关的倡议都发生在市级政府的层面上，在一群有投资经验，选择购买或者租赁位于这一带日益昂贵公寓的人士，与自认为其是公众码头的当然使用者（因为码头传统以来一直是像他们那样的非规范人士的空间）的年轻人之间上演。然而，这样的地方邻里冲突也是更大的经济力量（诸如金融资本的转移与曼哈顿日益昂贵的房价）所导致的结果。就在城市政府回应当地居民不希望被他们视为无法无天的乱性行为所打扰的需求的同时，世界资本与地方政治发生了交界。该等不同界面间的流动分析使我们看到在经济与性政治之间发生的非直接的、但是仍然非常强劲的联系。

连接点四：性、安全、和犯罪

“在此历史时刻，通过研究如何把经济与性相关的低俗行为规制为犯罪的过程，来探讨经济与性正义之间的连接也许是非常有指导性的。” — H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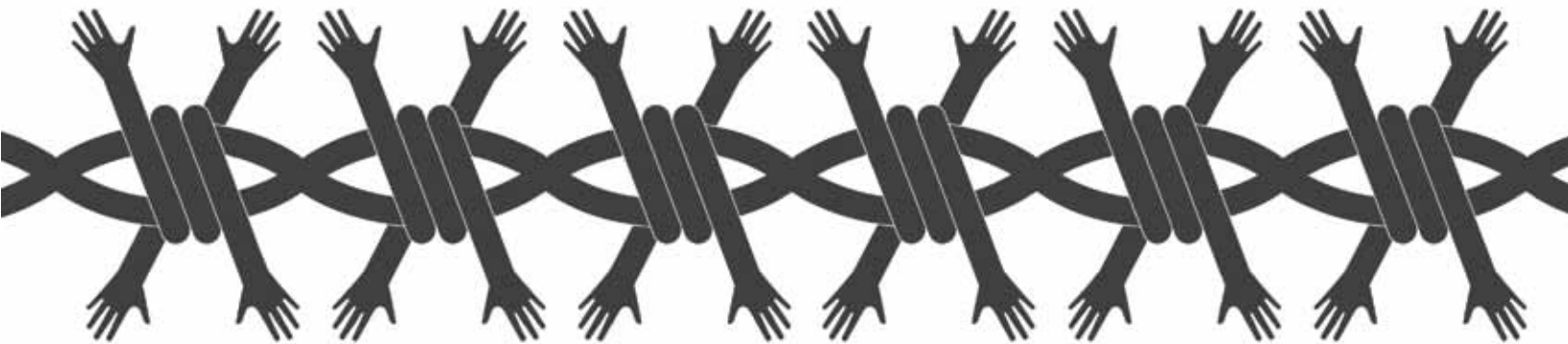
“性是新贸易。安全是大生意。并且所有这些监视与管制的基础建设已经被私人化。此乃新自由主义项目的关键点。” ——Kle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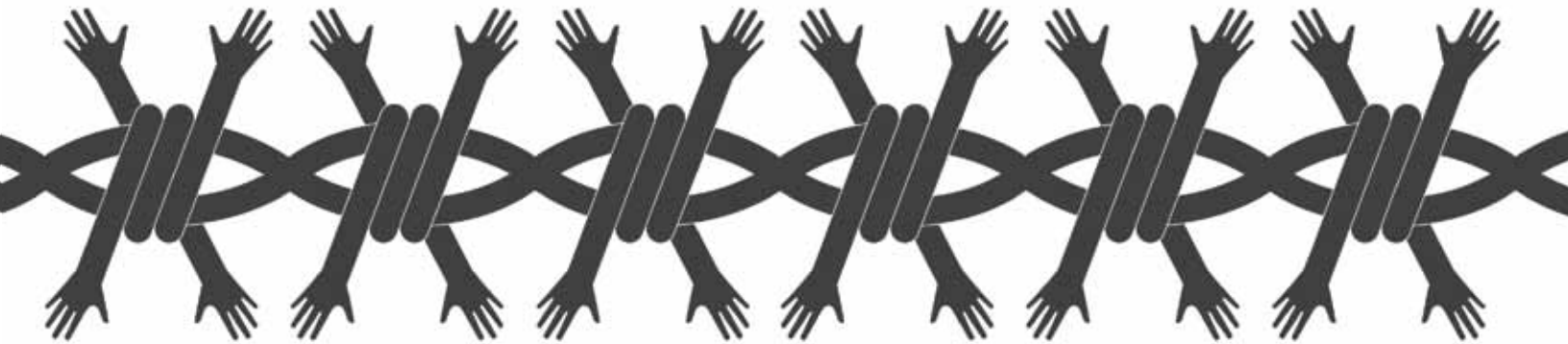
到目前为止，尚未被提及的性与经济正义之间的连接点是安全领域。正如最近许多社会活动家与学术作品（如，Klein 2007与 Hughes 2007）所阐述的，安全工业是“新兴产业”，并且被许多与会者认为是经济全球化的新面孔。在世界很多地区，我们见证了监视社会正在日益崛起，军队与政府的灾难救助队以安全的名义被私人化，并且我们生活的很多部分被刑事化：所有这些过程给跨国公司带来巨大的利润。

我们认为，创造安全社会的过程与性是息息相关的。当经济不安全形成精神上的围城（Klein），犹如家庭面临多重掠夺性力量威胁相关的断言所证实的，政府以保护我们的名义增强了警察侵犯基本自由的权力。在世界很多地区，法律改革拓展了刑事化的范围“包括几乎所有性行为的社会呈现”（Ho）。在全球范围内，以下趋势有所增加：把所有性工作视为人口买卖，所有网络性交换视为性掠夺行为，所有以性为主题的成人印刷品视为色情作品——并且把所有这些都定为刑事犯罪行为。Josephine Ho 把此称之为“社会空间幼儿化”——

从代表了以保护幼儿名义而严厉规制社会的冲动的社会相互作用点的角度，试图清除偏离的性行为，或者任何性行为。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保护幼儿远离危险的当务之急经常被扭曲地转变为合理化那些使幼儿不能接触关键性知识并使其在家庭空间中孤立从而导致他们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现象。

在安全社会，警察国家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焦点，扼制了其他创造性解决问题（例如，性商业化与性工作迁移）的方法（Cammett）。因为日常生存越来越不稳定，大量的生存策略也被刑事化，包括性工作与不同形式的性交易（Kempadoo）。相关的困难出现使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与同性恋青年面临无家可归、物质滥用与精神健康挑战的风险——所有这些使他们更容易受到刑事正义系统的管制。而且，正如 Ann Cammett 所指出的，在监狱里，“因为反复的性侵犯，男同性恋与变性妇女被挑选出来；并因性侵犯和强制约束形式的虐待，女同性恋、或者超越性别界限的妇女被挑选出来。不奇怪的是，女同性恋的数量在政治犯中占据了绝对多数，因为她们代表了性压抑与国家的政治压力的结合。以这种方式——将监狱本身视为性机构——通过在围墙内以及在更广泛的文化层面上强制异性恋正常规范化是政府权力的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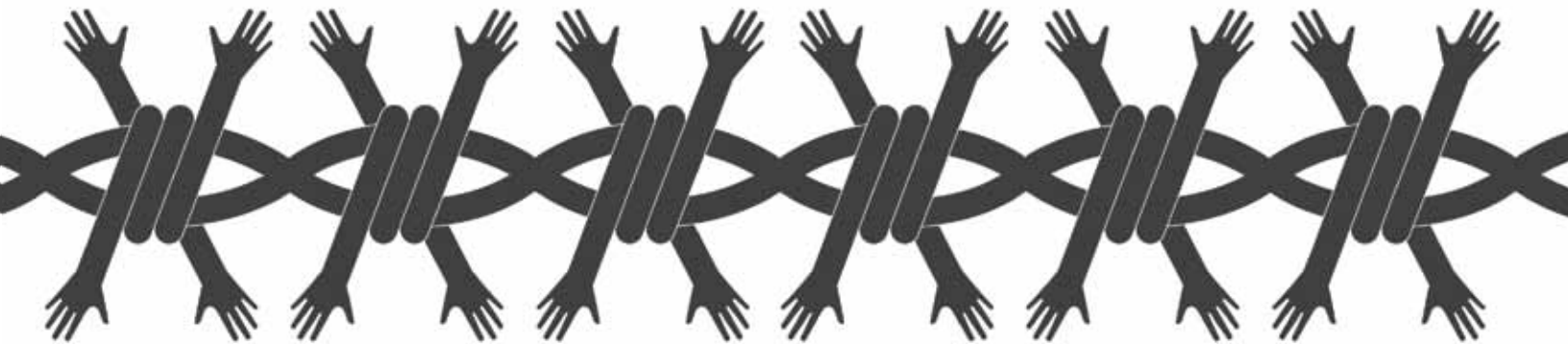


此类看似矛盾而又实际存在的现状——安全社会利用政府暴力试图保证安全——也已经被全世界的女权主义社会活动家明确阐述。她们已经通过Njoki Njoroge Njehû所称的“美好愿望”的方式进行表达——例如，政府试图为性暴力立法——其能够实际复杂化并创造威胁和/或破坏妇女的社会和经济健康以及她们的性健康和权利的弱点。假设政府本身是一个男性主导的机构，建立在政府基础上的安全措施能够强化女性作为弱者并需要保护的概念。因此，女权主义者倡导那些同意Njehû之担忧的人士，在讨论针对女性的暴力时，支持与经济正义紧密联系的性别公正，而不仅仅是安全本身。

相似地，很多女权主义者对于援用国家干预政策以解决妇女在性交易时所面临的不平等与暴力的方案表示了担忧。几个世纪以来，女权主义者一直主张，所谓“规范的性行为”与“交易的性行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此乃以下宣言的核心所在，即，没有人能够自由地结婚，除非经济上能够保持独立（Wollstonecraft 1992 [1792]）。但是，考虑到法规国家以及它们在社会运动中的联盟越来越经常地将性与交易的界限刑事化，我们如何把性与交易的界限概念化成为一项尤其重要的社会正义项目。例如，在菲律宾，反对人口买卖的运动

的一个意想不到的负面结果是进一步限制了移民妇女的劳工市场选择，迫使她们从事低收入的家务劳动，并使那些从事性化劳动的妇女的工作条件很难得到提高。Rhacel Salazar Parreñas 主张，应当致力于通过使妇女不会被迫从事性劳动的方式而援用政府警力以阻止性交易，与此同时，仅仅关注这些妇女的工薪劳动本身对于她们所面临的压抑形式而言也是不够的。

在这方面，与会者探讨了很多问题，从关押到性交易，从剥削性劳动到经济发展，所有讨论都强调了需要发展应对那些不依赖于监禁或者援用政府警力的新方式。举例而言，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为什么与亲昵相关的劳动一定被刑事化并且考虑这些相关性与刑事化对女性其他形式的工作的影响。我们也需要考虑在不同空间发生的不同种类的性劳动。Anna Marie Smith 建议：“首要的问题是，我们必须把保障最弱势群体获得以下权利排在第一位：她们的隐私、尊严、与自我决定权。新自由主义机构经常忽视低收入妇女与性少数派的需要：当这些机构建议帮助她们时，它们经常以增强社会安全的借口而减少‘营救’措施。”我们需要在保障这些社区的权利的同时，使它们不会更容易地受到监禁、放逐、或者对他们私生活的增强监视。



并且，很多与会者指出，激进的、或者左翼的政府已经间或地、热切地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支持刑事化，例如，支持在越南和在英国的性工作者强制隔离，或者提倡逮捕柔弱的、处于性边缘化的年轻人以保护他们自己。这能够体现在社会运动与政府之间的深刻矛盾关系中（Shah），然而，我们中的很多人都非常清楚的是，对性规范活动进行抨击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服务于跨国公司和社会——而不是抗争更高的经济正义。更好地意识到新自由主义的安全、保护、与法规所扮演的核心作用将使经济与性不公正之间的关系更清晰，并使探讨刑事化的替代性措施成为我们争取正义工作的核心。

核心术语

艾滋病／关贸总协定知识产权协议

艾滋病以及不同形式的政治反应提供了一个最清楚的关于性与经济（非）正义如何相互连结的实例。艾滋病感染率与跨越全球的贫穷相互联系，并且已经一跃成为首要的流行病之一，因为公共健康基础建设自20世纪80年代年代以来被经济重振严重破坏。绝大多数患有艾滋病的人，全球总人数的95%，生活在发展中国家（2007年11月之后）。然而，美国的艾滋病人人均消费超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艾滋病人35分之一，并且是高于非洲的艾滋病人1,000倍（2007年11月之后）。在艾滋病患病率最高的48个国家里，平均23%的儿童低于正常体重，并且这些国家总人口的30%影响不良。截止2005年底，一千五百二十万18岁以下儿童已经因为艾滋病失去双亲或者双亲中的一个；并且他们经常被迫失学并找低收入的工作（2007年11月之后）。

但是，不仅仅在全球南方国家艾滋病是一个经济问题。美国聚焦艾滋病成本与服务利用研究，唯一的国家级的对患有艾滋病的人群因受艾滋病感染而接受常规的或者持续不断的医学治疗的研究，发现46%的受访者的家庭年收入少于10,000美金，使他们在一般大众中处于收入水平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

（RAND 1999）。所有艾滋病受感染的美国人只有三分之一拥有私人保险，并且五分之一没有保险（RAND 1999）。在美国，有色种族妇女不成比例地受到艾滋病感染系一个非常明确的与性别与种族有关的经济非正义的实例。2004年，黑人女性在受艾滋病感染的女性人群中占据67%，但是其在美国女性人口中只占13%（Kaiser家庭基金会2007）。在妇女中，艾滋病死亡率最高的是黑人女性（Kaiser家庭基金会2007）。

贫穷与艾滋病感染无疑地由大量的原因造成，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不能达到为许多世界人口提供充分的健康保健。病毒由性传播的事实也是非常明确的原因之一。正如学者与社会活动家都已经发现的该等联系，越来越明显的是，拥有越少经济选择的人群也拥有越少性选择，也因此采取越少的措施使其防疫艾滋病传染。例如，经济上依赖于她们的生活伙伴的妇女也许有很少的选择，拒绝参与性，从而使她承担病毒传染的风险。相似地，对于拥有很少经济资源的人群，面临传染的风险与更急迫的经济剥夺之间的选择时，经常决定选择承担病毒风险。社会活动家因此转向把经济授权作为抗议艾滋病传

播，尤其是在抗议艾滋病毒通过性传播方面的一个核心内容。

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反抗艾滋病的斗争也要求社会活动家参与贸易谈判与知识产权纠纷（如抗议关贸总协定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为了保障获得救命药品，政府被迫挑战医药行业的垄断结构。尽管近年来，抗逆转病毒疗法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可以在中低收入国家获得，但是，截至2006年12月，只有28%的需要接受抗逆转病毒疗法的艾滋病患者真正接受了治疗（世界卫生组织2007）。在中低收入国家，最第一线的药品（从治疗初期开始服用的药品）的价格在2003年至2006年期间的降低比例，从37%到53%。但是，价格依然保持高位并且很少有非专利替代药品出现（世界卫生组织2007）。一些国家已经违反了国际药品专利，就为了使艾滋病药品更易获得并更能够被负担得起。2005年6月，巴西宣布它将开始制造非专利版的、由雅培公司制造的抗艾滋病药品Kaletra（Benson 2005）。2007年4月，雅培公司威胁在泰国停止发售新药以回应政府企图不顾国际药品专利而制造非专利版本的药品（Reuters 2007）。

新观念

正如Claudia Hinojosa在讨论中指出的,性与经济正义的任何观念将在不同的背景下以不同形式产生共鸣。或者正如Svati Shah主张的,基于她对孟买的性工作问题的研究,“最成功的内部交流的合作是那些在特定的背景下,特别注重工作的特定历史、力量、与重点”的合作,尤其是当该等特殊点通过“建立社会运动的交叉方法”而被确立时。Claudia Hinojosa与Svati Shah都建议,我们不应寻求建立一种至上的连接模式,而是应当意识到我们正义观念中的多元性,以便同时促进其既在概念框架内,又在行动上的结合。我们中的很多与会者对能够促进性与正义结合的观念提出了建议。我们在此把它们罗列如下,作为也许能在不同背景下切实可行的连接点的建议:

1. 社会安全

正如我们的与会者所注意到的,非常少的、新的强化“安全”的措施能够实际上使人民的生活或者他们的生计更安全。事实上,在二十世纪,由福利国家提供的不同形式的社会安全已经消失了。我们的与会者问道,接受社会活动家所要求的实际社会安全而不是更“广义的安全”意味着什么?反“战争”犯罪(或者毒品、或者反社会行为)导致了对边缘化人群的战争。我们能够想象并实施能够对社会生活提供基本支持的社会安全模式吗?

为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探讨许多其他问题,诸如:“安全”这一术语能够为我们推动正义做些什么?是否存在再次主张或者确认与不稳定相关的安全术语的可能性?就像在一些联合国会议上(联合国2003),我们能够使用“人类安全”这一术语主张获得一定形式的社会服务的权利吗?或者我们能用“社会安全”这一术语去为我们有权获得社会产品的集体权利辩护吗?即便

如此,我们应当如何保证我们不会掉进这样的陷阱:依靠政府通过使我们社区中的最弱势人群承担刑事责任的方法消除不安全并且该方法在当我们努力倡议性正义时,将会被利用来反对我们自己?

“社会安全”这一红色标题的潜在力量是,它包括了许多分散的问题。尤其是,社会安全能够识别对于那些生活于规范的家庭关系中的人以及那些生活于并支持非规范模式系统的人来说都越来越多地面临的不同形式的不安全模式。这两类人群的兴趣能够因此被连接在一起,而不是互相斗争。例如,越来越依赖于任何数量的家庭成员进入付费劳工市场以满足生活之需的传统家庭所经受的压力能够被不要求家庭结构的社会支持所缓解。其结果是,“家庭”的习俗对社会整体的价值减弱,并且失去一个家庭成员(无论由于生病、死亡、还是离婚的原因),将不会对家庭整体健康造成灾难性的威胁。另外,不依赖于单一家庭的一般性社会安全将使人们可以自由地形成多种形式的社会支持关系网,从而使每个人的生活更稳定,无论他们的性行为是否属于我们现在所称的规范模式。¹²

长期以来,反对该等社会支持的争论包括政府若提供支持将太过昂贵,但是在这里,如果把焦点放置在安全上,则凸显了政府选择将无尽的资金投入到并不必然给世界上的人们带来安全的“安全”措施上的问题,尽管该等措施的确为提供安全服务的公司创造了丰厚的利润。社会安全的争论证明了,该等资金应该更好地花费在能够解决人们日益增加的不安全感与降低造成暴力的社会怒气相关的社会措施上。

12. 参见,如Sasha Roseneil(2004)主张在英国,友谊网络对可持续性的保健提供非常重要,并且Loree Erikson(2007)致力于创造与个人性帮助和保健关系有关的替代性的支持结构。

2. 具有表征的、固有权利

专题讨论会上的一个讨论小组强调了性政治与由社会安全命名的社会供给的类型和经济政策的联系，他们甚至更进一步，提出了“具有表征的、固有权利”的概念 (Bergeron、Bernstein、Cooper、Hinojosa、Ho、Le Roux)。关于人权语言在当代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 (在其中，人权已经代替所有种类的社会正义) 的一些问题的讨论使该讨论组试图发展一种可以充分获得社会产品与基本的社会福利的权利的方法。她们感到，人权术语不是最好的提倡产品供给的方法。在另外一方面，具有表征的、固有权利，强调体现了社会生活以及它们所依赖的资源，该种体现的达成总是要求经济和性正义的存在。

Josephine Ho所提出的具有表征的、固有权利的一个例子是性剥夺的结束。Ho指出，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很多关于性剥夺的担忧 (尽管并不必然对此有许多有效的行动)，然而，并没有关于社会关系与法律能够实质上保障性剥夺的模式的方法的讨论。残疾人权利社会活动家长期以来主张，对性亲昵与性知识的否定系残疾人士所经历的一种毁灭性的压抑模式，而具有表征的、固有权利的概念非常清晰地推动了该观点 (Tepper in Erikson 2007, 42)。而且，无论是对有关传播生育权选择信息的“禁止公开讨论令”，还是试图在网络上限制性信息的宣传的法律，不同形式的法律强制实施了对性知识的剥夺。Ho提出，对这类性剥夺的结束可以被看作是具有表征的、固有权利。

该等具有表征的、固有权利的概念允许特定的性政治，例如对性剥夺的担忧，将会被放在更广义的人们有权享有而不是经常被剥夺的社会产品 (从教育与就业到最基本的生存产品，如食物、水、与健康保健) 的背景下讨论。这些社会产品之间的连接引导了性与产品循环深刻联系的方式，在被剥夺的情况下，该等联系将变得

更加强劲。举例来说，为防疫艾滋病而抗争的杰出倡议者已经越来越意识到有能力进行健康性接触对防疫艾滋病传染非常重要，并且此能力仰赖于个人能够获得基本社会产品的能力。任何个人越绝望，他或她越可能接受不健康的、只能提供最低的社会产品的性接触。没有对基本的具有表征的、固有权利的提供，通过改变性行为而防疫艾滋病的传播的努力将不可能获得成功的。

3. 我们都是非法的

Naomi Klein指出，“我们都是非法的”，这一2006年在美国代表移民权利的大罢工的口号可以作为除移民权利之外的大量问题的战斗口号。最新形式的新自由主义以使人们非法，然后以警力管制他们，从中牟利的安全经济为特征。在诸如美国和欧盟地区的边境安全事务的白日化已经使跨境活动越来越困难。把没有合适文件而试图跨境的人们关押并驱逐的情况正在日益增加，与此问题有关的新法律在惩罚移民的同时，也惩罚雇主。

Klein主张，此类日益强化的安全行动系新经济的一部分，而新经济依赖于保持并扩大对大量活动的刑事化，从而在任何时候，我们在名义上都是非法的——即使逮捕与起诉集中于社会边缘人群。不同形式的性商业已经被贴上该等非法标签，以至于一定形式的新开放，例如，在荷兰，性工作的合法化，已经随之带来其他地区警力的增加。比如说，很多卖淫形式被处置为“人口买卖”，即使他们不会涉及经常与所谓的“人口买卖”相关的强制性劳动。Klein的建议是，将以下不同形式的运动连接起来，致力于使人们从政府对其一定的谋生形式进行惩治的威胁中解放出来：移民权运动、废止与监狱改革运动、反对与毒品作战的运动、以及性工作者权利的运动。提出不同形式的问题能够代表一个旨在反对从人们生活刑事化中牟利的运动的不同侧面。

4. 安全粘黏

在研讨早期，Svati Shah 在讨论性与经济正义新观念之表达方式时，提出了“粘黏”的因素。在场的很多人，尤其是自喻为激进的、或者最左翼的社会活动家，已经经历了渐渐进入关于在不同背景下讨论性的不适应感。非常清楚的是，对关注并讨论性存在“黏得令人讨厌”的感觉在很多社会运动中广泛流传。然而，到今天为止，几乎每一个讨论组在试图讨论性与经济正义时，都包括了一定形式的“粘黏”因素。她们的努力反映了对性是复杂的、能够带来大量感情反应的、不能（或者不应该）被合理解释的现象的认知。而且，讨论组的讨论结果显示，接受性的复杂性空间是非常重要的——即，性所带来的不同形式的、矛盾的感情影响——因为它们事实上经常是性所具有的魅力的一部分。如果性与性实践不肮脏、有时候缠绕不清、有时候复杂，它们将不会产生激动、黏结、与愉悦，从而使其充满魅力的力量。因此，讨论组并不主张结束“粘黏”，而是提倡可以达到“安全粘黏”的政治。在这里，对性与性政治的认知是非常具有力量的，但如若不与同时追求性愉悦与性正义的可能性相连接，同时也可能是危险的。

我们在关于“新观念”的这一部分，突出了与性相关的积极自由的讨论，与此同时，努力保持对许多性关系中所存在的性不平等与性暴力的关注。我们因此强调愉悦作为我们就性与经济正义之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的核心问题包括：我们如何能够在保持关注暴力与安全问题的同时，也保证我们的工作不会被关于消极性权利与需要保护的讨论占据全部空间？在哪里我们可以建立性解放的、安全的、没有暴力以及其他形式的强迫因素在内的、愉悦的交互模式，并且该模式不依靠通过支持监狱产业或者以保护年轻人的名义减少对其性教育的方式实现？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性的复杂性以保证性实践不需要被净化而达到安全？

5. 每天的乌托邦

Davina Cooper 寻求“每天的乌托邦”的主意在讨论组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就像那些对具有表征的、固有权利感兴趣的与会者一样，她问道，在哪里我们能在除了那些被政治运动所组织的模式之外，找到身体与关系模式的力量。Cooper 已经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包括经济交换的替代性模式、以及每天的性乌托邦，如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女性浴室。多伦多浴室的试验显示了替代性的性实践的模式，并对是否能够具体化社会关系与供给的可能性提供了试验。在研讨会伊始，对此问题的典型回答是：“经济是为了什么？”因为经济本应当提供健康，并且，通过实践 Cooper 所称的“每天的乌托邦”而建立替代性的社会关系的寓意是什么？如果传统的经济依靠性法规与规范控制，提倡性民主与每天的乌托邦能够提供反思经济本身如何提供社会产品与服务的方法吗？最后，研讨会建议，思考性正义是反思以下最基本的经济问题的一条途径：我们如何能最好地提供人类健康？什么样的社会关系、附属关系、亲属关系、感情关系和连接可以使另外一个世界变得可能？

6. 性与价值

在致力于发展社会与性健康的新观念时，与会者问道，一个超越使自由免受侵害的消极保护并转向良好的性或性产品的积极性模式的新观念将意味着什么？在这个由性关系所创造的世界中什么是好的？我们能够如何支持性正义，不只是简单地对不同性身份的平等对待，而是将性视为“表达、探求、人际交流、探险、建立自信、与更高的理解”的运动（Cooper）？或者正如 Claudia Hinojosa 所提出的：“我们需要离开的是主流性文化，即，在该等性文化中，所有性实践，尤其是当它们旨在与愉悦而不是与生育相关时，都是有罪的，除非

能够证明其无辜性。在这方面，新道德框架的发展可能勾勒出我们能重新树立性是实践自由的政治文化的新观念。”

性正义的积极面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对性问题的授权如何能够有助于增加人们生活的其他部分之正义的可能性。例如，被授予性权利的人们能够更好地谈判劳动权吗？并且我们应该努力去发掘这种可能性吗？如果社区发展项目更少地关注小型企业，而是更多地关注培养妇女的性愉悦与G点性高潮，性别与发展组织可以在授权并避免妇女被更多的工作所负累方面作出更好地工作吗？

在探求这些相互连接点之时，我们对性作为价值创造点感兴趣。非常清楚的是，性能够创造愉悦，但是它也能够创造重要的社会关系、能够互相体谅的社区、以及帮助人们在大量不同的情形下支撑他们自己的亲密关系（Jakobsen 和 Pellegrini 2003）。这种性自由的积极观念对严格意义上的需求与欲望的分离——一种经常地甚至在激进的政治中，被运用来否定性对政治的重要性的分离——提出了挑战。例如，当美国迎来艾滋病危机时，在欲望的社区里相互联系的人们，也在政府以及受到病毒传染的个人的生物学家家庭严重对其忽视的情形下，共同致力于满足互相的需要。在这里，未解决的核心问题仍然是，我们如何在强调并赞颂这些连接点的同时允许政府对其提供帮助。很多不同的讨论组正致力于解决该等难题。

7. 性民主

全球南方的社会活动家已经重新架构了民主项目，通过培养参与、坚持民主倡议、以及思考如何在每日的生活中实现民主的方式，致力于“使民主成为具有一定意义的事务”（Fonow）。例如，在拉丁美洲，经济重整已经在很多情形下，使妇女所赢得的正式权利不再适用

（León），引发了关注于如何更好地把正式权利与实践它们的物质能力联系起来的运动。为鼓励这项工作，Lisa Duggan把社会支持替代性关系架构的概念称作“性民主”，非常有帮助地指出民主自由不仅能够适用于诸如演讲、媒体报道、和宗教等社会分类，也适用于形成有效的亲属关系与亲密联系的权利。性民主不仅保障其在经常被否定的领域内的民主自由，也允许在期待提供民主的生活中作试验的类型。在此意义上，民主的物质实践不只是关于权利与自由——尽管这些绝对重要——同时也是社会产品的形式，通过人们物质实践创造的社会正义，以及它们所创造的新型的关系与社区。

该等方法提供了性与能在人们所建立的不同形式的多元关系所找到的平衡点在的社交生活之间的一种替代性的新观念。例如，就性民主而言，成为单亲母亲并有时在艰难的情况下抚育孩子将是道德成就，而不是一种道德耻辱。相似地，扩大社会关系网以提供相互照顾将被公认为是构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属于个人选择的非重要事项。非常重要的是，这种社会正义的模式暗示我们必须理解人们所创造的不同形式的愉悦并不必然被资本主义所包括。经常地，我们将愉悦的可能性归因于商业文化或者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然而，专题讨论会的与会者主张，需要与欲望并不仅仅由商品来实现。同理，人们简单的对愉悦的需要和欲望也不仅仅由商品来实现；人们也可以制造愉悦。性民主是将性愉悦从资本主义抽取回来并在人类中发现性可能的方式。Duggan 注释道，该等转移要求社会支持。当然，政府现在将所有资源投入了性——但不是投入性民主。政府将其资金投入不同形式的性法规，补贴规范的性行为，并提供警力管制性商业。如果这些资源转向投入性民主，每个人将有可能拥有超越由资本主义与政府所限定的性生活。

未来的策略

“为了我们最终的生存，我们必须开始强调并发展可以导向更健康、更紧密、以及更有前瞻性的社区的方法” — Cammett

我们的讨论提出了大量困难的问题。回答它们需要在先前被分离的运动和问题间的新合作，和在经济与性正义的拥护者与那些工作于大量其他问题的人士间进一步的交流，以及新的组织方式。在本章节中，我们勾勒了这些新方法策略。

寻求正义的新方法不只是以新的社会运动的方式，但是需要包括新的发展、交流、与支持新观念的新方法以及为正义而抗争所要求的力量。Gabrielle Le Roux 提出了应当着重把握“以包罗万象的方式结合并分享被那些对这些与会问题拥有第一手经验的专家们所认同的信息。” Le Roux 通过描述社会活动家以及她们的故事，以表现并具体化鼓励人们继续追求正义的勇气和先见之明。其他形式的艺术表达对于发展预示替代性的可能性以及交流那些观念的能力都同等重要。因为该项工作并不在主流媒体中反映，发展替代性的媒体的意愿非常重要。录像、书籍、博客、表演、与展览对于激发公众辩论都很必要。

Mary Margaret Fonow 主张，我们应当更自觉地激发性欲活力，因为该活力系组织的一部分。例如，Fonow 建议，我们应当调动风趣的传统，即便有时候只是简单的活动，而且，事实上，以劳动组织为标志的性合作能够为建立这些联系和我们抗争所需的新力量提供支撑点。相似地，Ara Wilson 已经证明，非政府组织工作可以是性与政治的连接点。我们能够认识到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性的重要性。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创造更多的实现正义的精力资源呢？

寻求更广义的正义的一种主要方法是发展更好的联盟与合作点。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会议提出了大量旨在建立连接性与经济正义的新联盟的建议。例如，在劳工运动中，就拓展解决性问题的的工作存在激动人心的可能

性。考虑到旨在获得经济正义的同性恋运动在职业社团、大学、法院，以及更小的、更自治的空间进行，有必要培养可以在主流组织和机构内外运行，可以诉求至政府并可对政府提供批判性建议的策略。

正如劳工运动，现在已经存在非常成熟的运动，以支持女性经济授权，从而寻求打破对传统的养家糊口的家庭主妇的假设并提供给妇女经济自主权。性少数派的倡议者分享类似的关于家庭结构以及异性恋婚姻对健康的假设的影响的担忧，然而这两个运动很少连接起来。在这些运动中建立联盟将获得更强劲的支持，以解决人们在新自由主义下所面临的不安全与不稳定的问题 — 并在相关的授权中建立无论在传统的家庭单元内还是在家庭单元外的连接以及经济授权。对替代性的生活与关系的可能性的倡议，包括同性恋青年与那些为老人寻求住宅，寡妇与单身妇女的权利，公共幼儿保健与健康保健的空间，都能够以新的方式，非常有意义地联系起来。

相似地，监狱问题被深刻地包含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因为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监禁的模式大量地增加。监禁的问题也与异性恋传统规范的假设以及旨在结束家庭暴力与性开发的运动所转向监狱国家之方法紧密相关。（Cammett）。在监狱社会活动家，如那些名为“电阻”的组织的成员，与反暴力倡导者，如那些名为“煽动！有色种族女性反暴力”组织的成员之间的联盟，已经非常有效，并且相似的联盟可以在监狱社会活动家与性工作倡导者之间形成。劳动组织者也已经被纳入该等联盟，提供了一种通过经济授权而不是诉求监狱政府以解决劳动（包括性劳动）剥削问题的方法。

没有一个这样的联盟已经 —— 或者将 —— 容易地形成。不同的社会运动的历史与文化经常阻碍成功地联盟，并且，更多的主流组织可能担心与性倡导者联盟将会危及他们的资金来源和/或职责（见43页）。但是，提供这样的联盟框架至少是第一步。

与会者也建议，我们的未来策略应当利用现存据点的可利用空间，以讨论性与经济正义。例如，致力于解决权利问题的非政府组织是一个重要的场所。Ara Wilson 就此注释道：“很多实际存在的拓展了性正义与经济正义连接的项目正在非政府组织中进行，并且性与经济正义最广泛的讨论也已经在很多非政府组织与人权项目中展开，尤其是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之间激增的旨在致力于解决妇女问题的项目。在联合国—非政府组织之有限的、有质疑的参数中运行并依赖自由主义（或者在当时系新自由主义）的披露，一些非政府组织与人权机构的致力于性自由与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批判。例如，DAWN（在新时代发展妇女的可选择权）系一个关注经济再分配并把性权利作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议程的网络。当它们转移至激进的世界社会论坛的框架下，[DAWN加入了]一个南方女性的非政府组织的网络[旨在]开展“女权主义”对话以探讨新自由主义与军国主义政策对妇女性身体的影响。”¹³

在今天，作为提出政治主张最有力的披露，人权一般地限定为政治权利并排除经济问题。但是，很多那些致力于妇女性权利与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权利的国际人士强调权利的实质性概念要求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权利不可分离。例如，2006日惹原则（2006 Yogyakarta Principles），性与性别权利的宣言，包括“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平，包括充足的食物、安全饮用水、充足的卫生条件与衣物，并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不存在对性倾向与性别身份的歧视的权利。在该等运动发展的最高境界，非政府组织与人权组织发现了新自由主义与连接性自由主义与经济再分配之间矛盾。”¹⁴

现在，也存在非常有意思的旨在使性在发展的领域内被更重视的倡议。对此倡议的一个核心干预正在由一个英国发展研究机构的性与发展项目率先实践，该项目致力于在主要的发展机构的议程中纳入性问题。¹⁵它也赞



助解决性与发展问题的研究论文，包括一篇由秘鲁学者 Henry Armas 所撰写的论文，该论文明确主张：“较之住宅、教育、就业、政治参与权，性权利远远不是二等权利，而是在我们反抗贫穷的斗争中的一项重要权利并与住宅、教育、就业、政治参与权从本质上互相依存。” Armas 也运用最近在发展领域内思考贫穷的理论变化来主张“如果贫穷被理解为不只是物质化的，而是关于排斥、不健康、与对能力与自由的限制，那么缺乏性权利本身组成了贫穷”（2007, 1）。通过充分利用本项工作将性与人权和发展框架相联系，其目的在于干预主流交流（和资金来源），修整关于贫穷的多边行动，并将性正义坚决地列入那些更习惯于处理经济不平等的组织的议程之中。

13. 女权主义者对话由 Isis International (马尼拉), DAWN, INFORM (斯里兰卡), 致力于经济正义的妇女国际联盟, Marcosur 女权主义者立场, FEMNET - 非洲妇女发展与交流网络, 与印度自治妇女的组织的全国网络组成。

14. 参见性健康世界协会 (2008)

15. 参见 www.ids.ac.uk/go/research-teams/participation-team/projects-and-outputs/realising-sexual-rights。也参见 Cornwall, Correa, and Jolly (2008)。

一些社会运动的模式

尽管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现在已经存在大量的有帮助的，有时甚至是试验性的，并且我们在致力于经济与性正义时，能够从社会运动中吸取的模式。因为主要与发展运动相联系，小型的组织起了带头作用。在这里，我们提供一些人们以创新的方式解决性与经济正义实例：

劳工运动的新理念

在工作中骄傲(网址：<http://prideatwork.org>)系AFL-CIO（美国劳动联盟与工业组织议会）的选民组织。成立于1994年，旨在工会中倡议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的劳工权利并在劳工运动与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社区之间建立联盟。其组织的活动包括为支持密西根大学的研究生寻求从他们的健康福利中去掉对变性的排除所举行的罢工，对工会领导者进行有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知识的培训，在工会合同中与反歧视条款一起谈判生活伙伴的福利，以及为同性恋权利而开展政治斗争。

工作者出来！人权世界会议(网址：www.copenhagen2009.org/Conference.aspx)与在外游戏(Outgames)运动一起举行。参与者旨在寻求重新定义人权以包括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的劳工权利。该会议一个目标是帮助世界范围内的工会为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在工作场所以及更广义社会中的权利而抗争，并进一步拓展国际工会运动为结束基于性倾向与性别身份的歧视而开展斗争。

教育国际与公共服务国际(PSI)(网址：www.ei-ie.org；www.world-psi.org)2003年，这两个代表了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成千上万的工会组织中的成百万劳工的国际劳工团体结成联盟，提出了一系列的倡议，以拥护在教育和服务行业的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劳工的权利。这些倡议包括研究、网站、国际论坛、与国际团结联盟。

教育国际与公共服务国际出版了《工团主义者为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的权利而联合起来》。该出版物系第一本为促进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劳工的平等权利的国际指南，其阐述了最近的国际机构的决定如何能够被利用来保护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劳工，抗争歧视，与提高同性恋权利。

支持关系自治权的新理念

2001年，加拿大法律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名为《超越夫妇生活》的报告(网址：http://tabletoology.com/docs/beyond_conjugality.pdf)呼吁对法律进行根本性的修订，以表彰并支持所有照顾性的并相互依存的成人关系，无论该等关系是否在本质上是夫妻关系(超越婚姻,2006)。

2005年9月，位于犹他州的盐湖城的市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允许雇员选择他们自己的“成年被指定人”(网址：www.ci.slc.ut.us/council/newsreleases/benefits_ord_revised.pdf)去接受其福利。其“成年被指定人”可以是无限期地与该雇员生活在一起并在财政上与该雇员相联系的室友、亲属、或者生活伙伴：该法令建立了经济依赖而不是婚姻或者性关系作为延伸福利的标准(Watson 2007)。

在美国参与超越婚姻运动(网址：www.beyondmarriage.org)的社会活动家要求对广义关系(包括同户居住与家庭关系，无论其是血缘关系还是婚姻关系)的认同。他们寻求通过所有该等关系(无论婚姻还是市民状态)都能够有权获得维系生活所必需的政府支持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健康保健、住宅、社会安全与养老金计划、灾难恢复帮助、失业保险与福利帮助；教堂与国家在所有事项(包括关系的规定与认同，以及同户居住与家庭关系)上的分离；并且把我们有关性生活与性别选择、身份、与表达的政府法规中解放出来。

动员性工作的新理念

SANGRAM (网址: www.sangram.org) , 一个致力于解决妇女性工作者艾滋病的问题的印度组织, 已经积极地接受了一个依靠基层民众控制活动与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的全面策略。它把艾滋病弱势群体与其它与暴力、歧视、性别、以及人权违反等相关的弱势群体联合起来。例如, 正如SANGRAM网站所指出的一样: “避孕套被视为卖淫妇女和性工作者必须有权获得的救生设备。工作者接受诸如法律、继承、财产权和其他与艾滋病相关的性别问题的相关培训。” 为了这些目的, 它的同伴教育与避孕套发放项目由从事性工作的妇女团体管理, 并且它已经承担起反对“突然袭击、营救、与复原”的使命。

2003年, 在纽约的城市公正中心(网址: www.urbanjustice.org) 的Juhu Thukral 和Melissa Ditmore 为了记载妇女对其最急迫的政治需要的自我评估之目的而采访了大量不同样本的街头性工作者。他们发现, 街头性工作者所渴望得到的一项最重要的干预完全不是直接与卖淫有关, 而是不充足的住宅支持。他们主要的政策建议包括长期的和过度性的庇护所, 一个为那些接受政府帮助的人士提供拱“住宅第一”的模式, 并改变联邦、州、与地方资金投入, 从逮捕与监禁转向可以支付得起的住宅。

需要意识到把性工作相关的抗争与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议程连接起来的必要性已经被最近发生的抵制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实施“无卖淫地带”的运动中得到印证。类似其前身政策——“无毒品地带”。创造“无卖淫地带”将使那些占据公共街道并在经济上与种族上处于社会边缘的人士承担刑事责任。面对该被提议的法律, 不同的地方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更广泛的同盟, 表达他们强有力的联合反对, 宣称该法律系旨在便利中产阶级并削弱移民、无家可归者、与性工作者的公众集会权利的策略。

由不同的途径组织 (网址: www.differentavenues.org) (一个以同伴为基础的保护从事性经济的年轻人权益的组织) 领头, 与大量不同的旨在保护无家可归的人士、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以及移民的权利的维权组织结盟, 组成安全和多元化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盟 (网址: www.differentavenues.org/SafeDCAlliance.html) 显示了一个基于性与经济正义共同宪章之上的政治新观念。尽管联盟并没有能够最终阻止关于“无卖淫地带”的立法, 其成功建立联盟的确延迟了他们对该立法的实施并代表了通过结盟建立更广义基础上的性社会运动的成功模式。该联盟仍然存在, 甚至在城市决定实施“无卖淫地带”的立法之后在政治上更加活跃, 为了记载它们对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不同社区的影响以及推翻违反公民权利的政策而到街道上游行 (Bernstein 2007, 186-187)。

统一妇女网络 (网址: <http://wnu.womynsagenda.org>) 提供了另外一个实例。这是一个拥有超过 5,000 名在柬埔寨的女性、男性、以及变性人性工作者的全国性网络。统一妇女网络见证了柬埔寨的性工作者穷困无助的情形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有限的选择机会与柬埔寨自从被迫建立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所经历的巨大改变直接相关。大部分统一妇女网络的成员是从乡村到城市的国内移民。他们曾经用来获取食物的公有森林区域与他们曾经用来种植食物的公有稻田被私有化是他们不得不移居城市以寻找工薪工作的核心原因。大量的在柬埔寨的性工作者最开始从事的是为国际公司生产衣服或者食品的大型工厂的工作——但是, 他们较之性工作者工作时间更长且收入更低。统一妇女网络已经参与了很多大型的关于贸易与国际化问题的运动, 包括与柬埔寨制衣工人与亚太性工作者网络 (网址: <http://apnsw.org>) 的其他成员一起去参加反对2006年在香港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的运动。统一妇女网络继续致力于解决“自由”贸易

与国际化的影响相关的问题——包括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TRIPs) 与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 对于可负担的医疗与健康保健的影响 (见文字框, 42页)。

生育与性权利工作的新理念

致力于生育与性权利的女权主义者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在她们工作中的愉悦原则, 并努力以实际的方式实践这个原则。在尼日利亚, 生育健康与性权利国际中心

(INCREASE) (网址: www.increase-increase.org) 正在为来自种族与宗教社区的人们组织关于性愉悦的专题讲习班——为了演示, 该组织拥有自己的性玩具收藏。它也组织关于不安全堕胎的专题讲习班, 关于强奸话题的研讨会, 并讨论青春期妊娠。该组织的建立者, Dorothy Aken' Ova, 已经创造了一个双性妇女、女同性恋的网络, 为妇女找到社区并为她们解决健康需要提供了一个空间。相似的项目在其他地方也存在。例如, 在土耳其的妇女为妇女的人权 (WWHR) 组织 (网址: www.wwhr.org) 为妇女提供一项人权培训项目, 以寻求通过强调性表达、愉悦、与享受、树立授权观念。正如Ipek Ilkcaracan和Gulsah Seral 所解释道: “性暴力与生育性的性在不同的单元被有意识地讨论, 因此允许一个单独的空间, 使参与者能够仅仅集中于对性权利的积极理解, 包括知悉并喜欢人类的性器官的基本权利、寻找独立于婚姻的性经验、性高潮的权利、表达并追求性需要与欲望的权利、以及选择不体验人类性的权利” (2000, 187)。

在最近的思潮中, Henry Armas, 在秘鲁的非政府组织GRUPAL的前任主任思考了性权利与GRUPAL所致力于的关于年轻人的民主与参与权之间的关系。正如他所解释道: “GRUPAL方法的一个核心因素是研究市民权与民主的个人空间, 把那些 (也许被视为枯燥的或者能够提醒我们年轻听众关于腐败与政治的) 话题与他们更切身相关的话题 (如家庭、伙伴、以及他们的性) 连接

起来。我们希望鼓励参与者把他们自己的记忆、经历与民主联系起来” (个人交流)。通过参与关于诸如“你与你的性伴侣民主吗? 你听从自己的欲望吗? 当你说‘不’时, 受到了尊重吗? 你就愉悦进行交流了吗?” 等话题的探讨, Armas 主张GRUPAL的专题讨论会“会是促使人们思考民主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在呼吁致力于“性民主”时纳入性话题是一条能够真正实现所有人的参与、市民权、与权利的途径” (2007, 8)。

性与不稳定工作的新理念

无方向的不稳定 (网址: www.sindominio.net/karakola/precarias.htm) 是一个关注妇女与不稳定倡议, 由在马德里的一个女权主义社会中心在应对2002年6月在西班牙关于被提议的劳动改革的总罢工时提出。“面临不代表我们所做的这类细碎的、非正式的、并不易被发现的工作的一次总动员——我们的工作即不被工会所考虑, 也不受探讨中的立法的影响——一群妇女决定在罢工日在城市里集体游行, 把基本的哨兵线改变为‘罢工纠察员调查: 与妇女交流她们的工作与她们的日子’” (无方向的不稳定2004, 157)。通过在城市里宣传女性化的不稳定工作的此类游行促使那些参与的人士发展组织反抗的替代性的方法, 包括关注保健、性、与影响并将此作为核心问题; 强化地方与国际联盟; 增加问题的可视性。正如该团体所解释道: “如果我们希望打破社会烟雾, 我们必须有利地干预公共领域……制造大量的事件, 把不稳定作为一项冲突放在谈判桌上, 并把它与保健和性问题连接起来” (160)。该群体也致力于联合非专业工作人员 (如电话销售员、零售与服务工作者), 那些不稳定的行业 (如护士和通信), 以及那些传统地不易被发现的工作领域 (家庭钟点工、居家工作者、与性工作者) 的抗争 (无方向的不稳定 2004, 160)。

考虑到妇女就移民与“非法”问题的公共呼声在2003年的欧洲社会论坛中被遏制，一个被称为下一代性别组织（网址：www.nextgeneration.net）的女权主义学生、研究人员、与社会活动家的网络在论坛期间组织了一系列的专题讨论会，探讨性别、性、以及安全与移民讨论中的阶级之间的相互交接（Gutiérrez Rodríguez 2004, 153）。在柏林的一个女性同性恋、女权主义者、与移民工人的组织联盟也对移民妇女的权利进行了动员。在意大利，Laura Fantone主张：“不稳定是很多年轻妇女生活的组成部分”（2007, 5），不稳定问题已经使不同年纪的女权主义者形成联盟并促进女权主义者与意大利劳工运动的联系。正如她所记载的：“四个年轻女权主义者的网络 Sconvegno, Prec@s, A/matrix and Sexyshock（网址：<http://isole.ecn.org/sexyshock/menu2.htm>）已经特别地讨论到不稳定问题，有时候逆转它的本质涵义并积极看待它，或者，在古怪理论所激发的离题运动中，对这个术语可以视为对女性的挑衅”（2007, 7）。

在另外一个关于在意大利不稳定已经发展成为社会运动的一个新的催化剂的实例中，Beppe De Sario 列表演了不同种类的社会活动家运动（独立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创造性的社会运动、社会性的社会运动、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社会运动、与完全的女权主义社会运动）如何就这个主题进行动员。他特别地关注名为火星上的不稳定（网址：www.inventati.org/precarisumarte）的社会活动家网络，该网络自2005年开始在都灵非常活跃。该组织把融入了模仿天主教礼拜仪式的政治化的戏剧表演搬上舞台，并对其命名为“不稳定圣人与我们的临时工女士”（De Sario 2007, 22）。

另外一个运动连接的实例由“粉色狂欢节”（网址：www.inventati.org/pinkarnival/documentiPink/programma.html）提供，“一个在都灵的3天即兴活动，出乎意料地不按照所有运动的政治时间表或议程，

专注于身体与欲望的主题，以及最基本的自由表达和生活经历。桑巴舞乐队韵律抵制网络，都灵桑巴舞乐队的客人，都参与了粉色狂欢节。该活动的独到之处在于其活动形式本身，尽管它在城市社会运动的规模方面是微小的，即兴事件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例如，在都灵的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社会活动家加入了桑巴舞乐队与Gabrio社会中心的激进分子的队伍”（2007, 35）。

需要继续创新

正如Lisa Duggan与Svati Shah注意到的，大部分在当今关注性、种族、阶级的进步组织都是地方性的（而不是全国性的）。因此，“我们的挑战是如何跨境建立网络，超越国家的界定。坚实的地方组织能够形成更广泛的社团的基础，从而可以挑战‘国家的’的组织并使‘同性恋权利’列入大多数全国性的以及很多国际性的组织的议程中”（Duggan）。但是，该等地方组织需要相互连接起来，如果其希望得到此类广泛影响（Shah）。与会者也建议，有必要形成新的组织以解决不同的据点相互连接的问题。通常，这种新运动的成功在于把老的已经成熟建制的组织推向新的模式。通过挑战现有组织局限的方式打下夯实的基础也许可以促进社会变化，并为改变我们如何推动性与经济正义项目做出一份重要的贡献。

核心术语

资金

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结果是非政府组织正在做政府的外包工作。这对性意味着什么？什么样的有关资金与社会运动职业化的社会活动家辩论开始论及性？以及什么样的教训可以从那些辩论中获得以帮助组织致力于社会改变？

最明显的，从传统资源获得的资金能够限制非政府组织与性有关的工作。布什总统150亿艾滋病救援紧急计划（PEPFAR）资金的三分之一直接拨付给与禁绝有关的防疫信息（Health GAP 2006），例如，收到PEPFAR资金的组织必须同意一个“卖淫忠诚誓言”，通过其使它们保证反对性工作（Avert 2008）。该项目也允许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拒绝提供有关艾滋病防疫可靠方法的信息，比如避孕套。而且，非政府组织的职业化也导致其更少地对性持有争议性的、会破坏该组织获得资金的名声的立场。

但是，在其他方面，自我审查也会围绕经济问题而发生。尽管“非政府组织”具有“非”的字眼，但是政府经常选择支持哪个非政府组织，并且资金的其他主要资源来自私有资金，如公司资金。因此，正如Naomi

Klein 所主张的：“我们需要谈论钱因为其影响我们的运动...我们需要运用一个关于钱的基本的经济分析，以了解钱如何改变我们，很多的钱甚至更多地改变我们...最好的例子必须与艾滋病激进主义联系起来，非常尖刻的有关知识产权与TRIPS的语言消失了。1 在2001年峰会上，2 我们谈及知识产权，法律架构与药物的绝对权。盖茨 [基金会] 的钱已经使有关性工作健康权的教育性讨论更容易，与此同时也使有关TRIPS的讨论更困难。因为盖茨自己与美国微软公司和制药公司一起，已经是主要的坚不可摧的知识产权建筑的建筑师。因此，我们正在结构性地调整并且我们需要对此进行讨论。

最后，在政府减少供给之后所兴起的与之相平行的社会服务经常地与宗教组织相联系。广义地说，非政府组织的成长与个人作为慈善的对象而不是正义的对象之观念的创立紧密相连。更具体地说，保守的基督教非政府组织进入政府权力圈能够证明对性正义的毁灭性破坏（Ho）。2006年，布什政府拨付了21亿美金给信仰性的组织和项目，其中有的准备做资助只与禁绝有关的教育、

提倡婚姻的努力、以及为贫困男性和女性就其所定义的有争议的健康关系提供咨询服务，（Hardisty 2008）。保守性的宗教非政府组织也在创立和执行与纯净社会（包括真实的与虚拟的）空间有关的政策、立法、与策略方面做得非常成功（Ho）。在2006年，台北市与名为“外流国际”的非政府组织（一个国际性的、提倡“通过耶稣基督的力量从同性恋中解放”的基督教组织）相联系的立法者— 威胁取消在台北市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同性恋节日的资金，因为城市资金不当被用来“促进同性恋”。基督非政府组织以及它们的联盟也成功地动员支持针对性买卖、色情表演、性工作、和控制网络内容等的国际措施。该等国际议定书被用来促进比较性的、经常是更严格的、地方立法— 所有这些都使关于性正义的国内抗争更加困难。我们的与会者因此建议，不仅需要增加关注资金如何影响我们以相互连接的方式为正义而抗争的能力，也需要增加关注新自由主义通过非政府组织的服务性供给如何增强那些反对性正义的进步性的新观念的人们的力量。

1. 关贸总协定知识产权协议，由世界贸易组织管理，该协议制定了很多知识产权规定之模式的最低标准。

2. 第一个关于获得艾滋病非专利药的国际峰会于2001年5月3-7日，在瓦加杜古（布基纳法索首都）举行。参见网址：<http://www.genericsnow.org/pdf/pressreview.pdf>。

你可以如何参与?

50年已经足够：美国全球经济正义网络

www.50years.org

50年已经足够：美国全球经济正义网络系一个由超过200个美国基层的、妇女的、团结的、基于信仰的、政策的、社会与经济正义的、年轻的、劳动的和发展的组织组成的联盟，致力于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深刻改革。

AHRC法律、性别与性研究中心

www.kent.ac.uk/clgs

CentreLGS是一个批判性的、跨学科的国际研究中心，推进有理论根据的、与政策相关的、在法律、治理、与规范活动中探索性别与性的学术研究。

拉丁美洲信息社

<http://alainet.org>

拉丁美洲信息社是致力于全面报道人权、性别平等、与人们参与在拉丁美洲的发展与政策的通讯组织。

在发展中的妇女权协会

www.awid.org

在发展中的妇女权协会是一个联合、提供信息给、并动员人们和组织，通过提高那些为妇女授权与社会公正而工作的个人与组织的能力，以实现性别平等、可持续发展、与妇女人权的国际会员组织。

为性与生育权协定而抗争的运动

www.convencion.org.uy

为性与生育权协定而抗争的运动于1999年启动，系一个在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的女权主义组织、网络、和运动之间的联盟。在该协定的众多倡议中，包括定义与保护性与生育权、就这些问题进行公开辩论、并就那些染上神秘与偏见之“瘟疫”的话题的提供可靠的信息。

全球正义中心

www.globaljusticecenter.org

全球正义中心，位于墨西哥的瓜纳华多市，系一个国际教育与研究网络，致力于渐进社会运动，分析公司全球化的世界影响，并探索由新自由政策所造成的社会与经济问题之可行的与公正的解决方法。

通俗经济学中心

www.populareconomics.org

通俗经济学中心系一个非盈利性的由位于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的政治经济学家组成的社团，其分析经济不平等与不公正的根本原因，包括基于种族、阶级、性别、国家、与种族划分的压迫系统，并给予那些为了社会与经济正义而抗争的人们有用的经济工具。

性研究中心

<http://sex.ncu.edu.tw/english/EnglishCenterIntroduction.htm>

台湾国立中央大学的性研究中心系一个基于研究与信息的社团，关注与性别和其他社会差异（如阶级、种族、年纪、与残疾）相关的性话题

穆斯林社团的性与身体权的同盟

www.wwhr.org/csbr.php

该同盟包括超过40个来自中东、北非、南亚与南东亚的不同背景的致力于性问题（如妇女权、人权、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健康、研究）的组织。它运用一个整体分析的方法并相信性权利与经济、社会公正、以及平等相互联系。

DAWN: 新纪元女性之替代性发展

www.dawnnet.org

DAWN是一个来自经济南方的，从事女权主义研究与全球环境分析，并致力于经济公正、性别公正、和民主的妇女学者与社会活动家网络。

关注于全球南方

www.focusweb.org

关注于全球南方是一个工作于泰国、菲律宾、和印度的非政府组织，联合政策研究、倡导、社会运动、与基层民众之力量建设，为了发展批判性的分析并鼓励与公司国际化、新自由主义和军国主义相关的国家与国际的政策之辩论。

世界社会论坛

www.forumsocialmundial.org.br

世界社会论坛是一个公开的聚会地点，在该论坛上，社会运动、网络、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民间的反抗新自由主义的社团组织与一个由资本主义或者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聚在一起为了有效的行动而建立网络。

性别行动

www.genderaction.org

性别行动是一个唯一的致力于在所有国际金融机构（IFI）的投资（如那些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投资）方面，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权，以保证男女平等地参与并收益于所有IFI的投资。

反对买卖妇女的世界联盟

www.gaatw.net

反对买卖妇女的世界联盟 (GAATW) 是一个由来自世界所有地区的超过80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联盟，致力于解决人口买卖的核心问题，即，在正式与非正式的经济行业以及公有与私有的工作组织中强制劳工与服务的问题。GAATW组织也促进所有移民与他们的家庭反对日益全球化与不拘形式的劳工市场的威胁之权利与安全，并为此进行辩护。

健康国际化项目

www.healthgap.org

健康国际化项目是一个由位于美国的艾滋病与人权社会活动家、患有艾滋的人群、公共健康专家、自由贸易倡导者、以及发起并参与反对忽视政策和拒绝对成百万的人进行救治而加速了艾滋病传播的运动的个人组成的组织。

女权主义经济国际协会

www.iaffe.org

女权主义经济国际协会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组织，寻求在经济问题上提出女权主义质询并从女权主义角度教育经济学家与其他人士。

全球化国际论坛

www.ifg.org

全球化国际论坛是一个南北研究与教育机构，由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经济学家、学者、和研究者组成，旨在就经济全球化的文化、社会、政治、与环境影响进行分析与批判。

国际性与贸易网络

www.igttn.org

国际性与贸易网络 (IGTN) 是一个就性与贸易问题提供技术信息的女权主义专家组成的网络。IGTN 作为政治催化剂，为批判性女权主义者在贸易与国际化问题方面的前景与行动拓展了空间。

性工作者国际工会

www.iusw.org

性工作者国际工会为那些在性行业工作的人士之人权、民权、与劳动权而抗争

公正的工作

www.jwj.org

公正的工作是一个由地方多层次基层民众之工会、教会、学生、与社区组织组成的网络，致力于把工人权利作为更大的为争取经济与社会正义的运动的一部分而抗争。运用正义运动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公正的工作网络建立了把工作空间的正义扩展到包括可以支付得起的住宅、全民的健康保健、以及广泛的社区发展问题的同盟。

我们的世界不是为了销售同盟

www.ourworldisnotforsale.org

我们的世界不是为了销售同盟是一个由致力于挑战旨在以人民和环境为代价而促进全球最强的公司的利益之贸易与投资协议的组织、社会活动家、与社会运动组成的全世界网络。

健康伙伴

www.pih.org

健康伙伴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组织，致力于与社区团体结伴工作于那些旨在提高贫穷社区的健康水平并减轻良好健康的社会与经济障碍的项目。

粉色空间

www.pinkspace.com.cn

一个位于北京的组织，其宗旨在于在中国促进性权利并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社会活动家、从业者、与学者建立合作关系。主要关注受到性压迫的妇女，其定义为一个包括“性工作者、残疾人、单身母亲、离婚妇女、老年妇女、艾滋病毒携带妇女、年轻人、女同性恋、与变性人等”在内的社团。该组织通过热线、专题讲习班、与聚会活动为这些人群探讨性提供空间。它也提供技术支持，帮助这些人群满足她们的身份需要并实现她们的性权利。

愉悦项目

www.thepleasureproject.org

愉悦项目是一个旨在促进积极的安全的性与艾滋病防范的教育倡议。该项目与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健康行业合作，为那些希望在他们的工作中采取更加积极的性方式的性健康培训师和咨询师提供培训、咨询、以及研究和发表的机会。

同性恋追求经济正义

<http://qej.tripod.com/qej2/index.htm>

同性恋追求经济正义是一个激进的非盈利性的组织，其宗旨在于在性与性别解放的背景下促进经济正义，并改变在我们的社区里创造贫穷与经济不平等的系统。

拒绝与抵抗！

www.refuseandresist.org

拒绝与抵抗！是一个无党派的全国性成员组织，旨在建立并鼓励很多抵抗的力量：在学校、社区、和媒体演讲，组织论坛和会议，在街道上游行示威，并在创造与表演文化作品。

城市正义中心的性工作者项目

www.sexworkersproject.org

城市正义中心的性工作者项目 (SWP) 为性工作者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培训，并从事对性工作者的文献记载和政策倡导。运用基于文献记载的倡议、政策分析、培训和教育、以及与社区服务提供者合作，SWP 提出了对这些弱势的和边缘化的人群所面临的问题之实用的、长期的解决方案。

性与发展项目

www.ids.ac.uk/go/research-teams/participation-team/projects-and-outputs/realising-sexual-rights

发展研究机构的性与发展项目是一个支持质询与交流的研究组织，旨在重新思考性、权利、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在不同背景下致力于实现他们的性权利的人群之间建立更强的联系

Sylvia Rivera法律项目

www.srlp.org

Sylvia Rivera法律项目(SRLP)是一个社团组织，致力于保障所有人可以自由地决定她们的性别身份和表达的权利，无论其收入或者种族并不需要面对骚扰、歧视、或者暴力。它的成立是基于对性别自我决定是与种族、社会、与经济正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理解，SRLP 寻求增加那些变性的、阴阳人的、或者性别不一致的低收入有色种族人群的政治呼声与可视性并提高他们的社区获得社会的、法律的、和健康服务的水平。

为公平经济而团结

www.faireconomy.org

为公平经济而团结组织旨在推广财富与权力集中将破坏经济、腐败民主、加深种族分离、并拆分社区之意识。

印刷作品

- Alexander, M. Jacqui. 《交叉教育学：关于女权运动、性政治、记忆、与神圣的思考 (Pedagogies of Crossing: Meditations on Feminism, Sexual Politics, Memory, and the Sacred)》.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Armas, Henry. 《谁的性法院：贫穷、参与、和性权利 (Whose Sexualities Count: Poverty, Participation and Sexual Rights)》. Working Papers Series 294. Brighton, UK: Th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7.
- Bakker, Isabella, ed. 《策略性科学：性别和经济政策 (The Strategic Silence: Gender and Economic Policy)》. Atlantic Highlands, NJ: Zed Books, 1994.
- Bakker, Isabella and Stephen Gill, eds. 《力量、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人类之不/安全 (Power, 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Human In/Security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Palgrave, 2003.
- Barker, Nicola. 《性与民事伙伴法：(非) 夫妇生活的未来？ (Sex and the Civil Partnership Act: The Future of (Non) Conjuality?)》. 《女权主义法律研究 (Feminist Legal Studies)》 14.2 (2006) 241 - 59.
- Bedford, Kate. 《发展伙伴：性别、性、和改革世界银行 (Developing Partnerships: Gender, Sexuality, and the Reformed World Bank)》.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2009 (即将出版).
- Beneri, Lourdes and Shelley Feldman, eds. 《不平等负担：经济危机、持续贫穷、与妇女工作 (Unequal Burden: Economic Crises, Persistent Poverty, and Women's Work)》.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2.
- Benson, Todd. 《巴西复制由雅培制药公司制造的艾滋病药品 (Brazil to Copy AIDS Drug Made by Abbott)》. New York Times 25 June 2005. www.nytimes.com/2005/06/25/health/25drug.html
- Berlant, Lauren and Michael Warner. 《公众的性 (Sex in Public)》. Critical Inquiry 24.2 (1998): 547 - 66.
- Bernstein, Elizabeth. 《购买的意义：欲望、要求、与性商业 (The Meaning of the Purchase: Desire, Demand and the Commerce of Sex)》. 《人种论 (Ethnography)》 2.3 (2001): 389 - 420.
- Beyond Marriage. 《超越同性婚姻 (Beyond Same-Sex Marriage)》. 26 July 2006. http://www.beyondmarriage.org/full_statement.html
- Brodie, Janine. 《转变边界：性别和重整政策 (Shifting The Boundaries: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Restructuring)》. 《策略性科学 (The Strategic Silence)》. Ed. Isabella Baaker. Atlantic Highlands, NJ: Zed Books, 1994. 46-60.
- Bowlus, Audra J. and Shannon Seitz. 《家庭暴力，雇用、和离婚 (Domestic Violence, Employment, and Divorce)》. 《国际经济评论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47.4 (2006): 1113 - 49. 《为性权利与生育权协定而抗争：宣言 (Campaign for a Convention on Sexual Rights and Reproductive Rights: Manifesto)》. 2nd ed. Translated Sharmila Bhushan. Lima, Perú, 2006.
- Cohen, Cathy. 《黑暗的分界线：艾滋病与黑色政治的分界 (The Boundaries of Blackness: AIDS and the Breakdown of Black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 Conaghan, Joanne and Emily Grabham. 《性与市民护理者：好的同性恋与第三种方法 (Sexuality and the Citizen Carer: The Good Gay and the Third Way)》. 《北爱尔兰自治区法律季刊 (Northern Ireland Legal Quarterly)》 58 (2007): 325 - 341
- Cornwall, Andrea, Sonia Correa, and Susan Jolly, eds. 《与身体一起发展 - 性、发展、与人权 (Development with a Body - Sexualities, Development and Human Rights)》. London: Zed Books, 2008.
- Datta, Rekha. 《从发展到授权：印度的自我雇用妇女协会 (From Development to Empowerment: The Self-Employed Women's Association in India)》. 《国际政治、文化、与社会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16.3 (2003): 351 - 68.
- DAWN. 《人口与生育权：来自南方的女权主义角度 (Population and Reproductive Rights: Feminist Perspectives from the South)》. Calabar, Cross River State, Nigeria: DAWN, 1994.
- De Sario, Beppe. 2007. 《‘火星上的不安全’：反对不安全的激进主义试验 (‘Precari su Marte’: An Experiment in Activism Against Precarity)》. 《女权主义评论 (Feminist Review)》 87 (2007): 21 - 39.
- Duggan, Lisa. 《不可思议地减少公众：性政治与对民主的拒绝 (The Incredible Shrinking Public: Sexual Politics and the Decline of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2002.
- Elson, Diane. 《性别觉醒分析与发展经济 (Gender-Aware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政治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第6版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6th edition)》. Eds. K. P. Jameson and C.K Wilber. New York: McGraw Hill, 1996.
- Erikson, Loree. 《揭示女性辍带：把耻辱点作为残疾人士的抵抗点之性积极反思 (Revealing Femmegimp: A Sex-Positive Reflection on Sites of Shame as Sites of Resistance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tlantis 31.2 (2007): 42 - 52.
- Fantone, Laura. 《不安全的变化：当代意大利的性别与生育政治 (Precarious Changes: Gender and Generational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Italy)》. 《女权主义评论 (Feminist Review)》 87 (2007): 5 - 20.
- Ferrie, J., et al. 《主要人事变动与工作不稳定性之预测对健康的影响 (The Health Effects of Anticipation of Major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Job Insecurity)》. 《社会科学与医学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46.2 (1998): 243 - 54.

- Finkelhor, David. 《性虐待儿童之国际流行病学 (The International Epidemiology of Child Sexual Abuse)》. 《儿童虐待与忽视 (Child Abuse and Neglect)》18.5 (1994): 409 - 17.
- Folbre, Nancy. 《谁与孩子们玩耍? 性别与结构限制 (Who Pays for the Kids? Gender and the Structures of Constraint)》.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Foucault, Michel. 《“治理性” 傅柯影响: 治理性研究 (“Governmentality.”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Eds. 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87 - 104.
- Fudge, Judy and Rosemary Owens. 《不安定的工作、妇女、与新经济: 对法律规范的挑战 (Precarious Work, Women, and the New Economy: The Challenge to Legal Norms)》. Eds. Fudge and Owens.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06. 3 - 27.
- Gill, Lesley. 《不安定的属国: 玻利维亚的性别、阶级、与家庭服务 (Precarious Dependencies: Gender, Class, and Domestic Service in Boliv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Girard, Françoise. 《美国民主与国际政治对性的全球影响 (The Global Implications of U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cies on Sexuality)》. 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 for Sexuality and Social Policy Working Papers, no. 1 (2004). www.mailman.hs.columbia.edu/cgsh/cgsh.html
- Glenn, Evelyn Nakano. 《从奴隶到服务工作: 付薪的家庭劳动中的种族分离之历史延续性 (From Servitude to Service Work: Historical Continuities in the Racial Division of Paid Domestic Labor)》. Signs 18.1 (1992): 1 - 44.
- Goldman, Michael. 《帝国本质: 世界银行与为全球化时代的社会正义而抗争 (Imperial Nature: The World Bank and Struggles for Social Justic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Hardisty, Jean. 《推到祭坛: 推广婚姻的右翼根源 (Pushed to the Altar: The Right Wing Roots of Marriage Promotion)》. 《促进婚姻 (Marriage Promotion)》series pt 1. Somerville, MA: Political Research Associates/Women of Color Resource Center, 2008.
- Hughes, Solomon. 《来源于恐惧政治的恐怖主义战争公司的暴利 (The War on Terror, Inc. Corporate Profiteering From the Politics of Fear)》. Verso: London, 2007.
- Ilkharacan, Ipek and Gulsah Seral. 《性愉悦作为妇女的人权: 土耳其基层民众培训项目之经验 (Sexual Pleasure as a Woman's Human Right: Experiences from a Grassroots Training Program in Turkey)》. 《穆斯林社会的妇女与性 (Women and Sexuality in Muslim Societies)》. 《伊斯坦布尔、土耳其: 为妇女人权而奋斗的妇女 (Istanbul, Turkey: Women for Women's Human Rights)》. Eds. Ilkharacan, Pinar. Istanbul, Turkey: Women for Women's Human Rights, 2000. 187 - 96.
- Jakobsen, Janet and Ann Pellegrini. 《爱上罪恶: 性法规与宗教容忍度的限制 (Love the Sin: Sexual Regulation and the Limits of Religious Toleranc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3.
- Jansen, M., L. Snoeckx, and D. Mortelmans. 《重新建立伙伴关系与 (重新) 雇用: 应对解散伙伴关系的经济结果之策略 (Repartnering and (re-)employment: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artnership dissolution)》. 论文在英国家庭讨论小组调查会议 (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 Conference) 上发表, 5 - 7 July 2007, University of Essex, Colchester UK.
- Kempadoo, Kamala. 《加勒比海的性: 性别、种族、与性劳动 (Sexing the Caribbean: Gender, Race and Sexual Labor)》.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Klein, Naomi. 《震惊的学说: 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7.
- León, Irene and Phumi Mtetwa. 《全球化: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的替代性选择 (Globalization: GLBT alternatives)》. Quito, Ecuador: GLBT South-South Dialogue, 2003.
- León, Irene, ed. 《妇女抵抗: 经验、观念、与建议 (Mujeres en Resistencia: experiencias, visiones y propuestas)》. Quito, Ecuador: ALAI, FEDAEPS-Ecuador, 《女性世界长征 (Marcha Mundial de las Mujeres)》, 《拉丁美洲妇女转变经济联盟 (Red latinoamericana Mujeres Transformando la Economía)》, 《女性立场 (Articulación de Mujeres)》, 《贫穷妇女的道路 (CLOC/Vía Campesina)》, Dialogo Sur/Sur LGBT, 2005.
- Lind, Amy. 《性别之看似矛盾而实际却可能正确的说法: 厄瓜多尔的女性运动、国家重整、与全球发展 (Gendered Paradoxes: Women's Movements, State Restructuring, and Global Development in Ecuador)》.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Martin, Nicole. 《离婚后妇女之生存条件恶化 (Women Worse Off After Divorce)》. 《每日邮报 (Daily Telegraph)》7 July 2007.
- Mink, Gwendolyn. 《福利之结束 (Welfare's En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 Moser, Caroline. 《性别规划与发展: 理论、实践与训练 (Gender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Theory, Practice and Training)》.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 Oswin, Natalie. 《在新自由主义南非制造同性传统活动: 承认、重新分配、与平等项目 (Producing Homonormativity in Neoliberal South Africa: Recognition, Redistribution, and the Equality Project)》. Signs 32.3 (2007): 649 - 69.
- Perkins-Gilman, Charlotte. 《女性与经济 (Women and Economics)》. New York: Source Book Press, 1970 [1898].
- Peterson, V. Spike. 《全球政治经济的关键性重写: 融合再生产、生产性、与实质性经济 (A Critical Rewriting of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grating Reproductive, Productive and Virtual Econom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Precarias a la deriva. 《在女性化的不稳定工作线路上漂泊 (Adrift Through the Circuits of Feminized Precarious Work)》. 《女权主义评论 (Feminist Review)》77 (2004): 157 - 61.
- PrDgl, Elisabeth. 《致力于女权主义者政治经济 (Toward a Feminist Political Economics)》. 《国际女权主义政治杂志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4.1 (2002): 31-7.
- Puar, Jasbir. 《同性恋移动的线路: 旅游业、旅行、与全球化 (Circuits of Queer Mobility: Tourism, Travel, and Globalization)》. GLQ 8.1 - 2 (2002): 101 - 37.
- Richardson, Diane. 《希求一致性? 规范化新自由主义政治的兴起 (Desiring Sameness? The Rise of a Neoliberal Politics of Normalisation)》. 《对立 (Antipode)》32.2 (2005): 515 - 35.
- Rittich, Kerry. 《重新特征化重整: 市场改革之法律、分配、与性别 (Recharacterizing Restructuring: Law, Distribution and Gender in Market Reform)》. New York: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2.
- Rose, Nikolas. 《自由的力量: 重新架构政治思考 (Powers of Freedom: Reframing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Roseneil, Sasha. 《为什么我们应该关心朋友: 古怪化社会政治中的关心假象之争论 (Why We Should Care About Friends: An Argument for Queering the Care Imaginary in Social Policy)》. 《社会政策与社会 (Social Policy and Society)》3.4 (2004): 409 - 19.
- Rubin, Gayle. 《思考性: 记录性政治中的根本理论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男女同性恋研究之读者 (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Eds. Henry Abelove, Michèle Aina Barale, and David M. Halperin.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1984]. 3 - 44.
- Sen, Amartya. 《发展系自由权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9.
- Sen, Gita, and Caren Grown. 《发展、危机、和替代性新观念: 第三世界女性的角度 (Development, Crises, and Alternative Visions: Third World Women's Perspective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7.
- Siegrist, J. 《高努力/低回报条件的负面健康影响 (Adverse Health Effects of High-Effort/Low-Reward Conditions)》. 《职业健康与心理杂志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Psychology)》1.1 (1996): 27-41. Sparr, Pamela, ed. 《抵押妇女的生活: 结构化调整的女权主义者批判 (Mortgaging Women's Lives: Feminist Critiques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London: Zed Books, 1994.
- United Nations. 《人类安全之现在: 保护并授权人民, 联合国人类安全委员会的最终报告 (Human Security Now: Protecting and Empowering People, the Final Report of the UN 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3.
- van Dijck, Pitou. 《世界银行与拉丁美洲社会的变革 (The World Bank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tin American Society)》. 《拉丁美洲之政见 (Politics of Expertise in Latin America)》. Eds. Miguel Centeno and Patricio Silv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96 - 125.
- Vosko, Leah. 《性别、不稳定的工作、与世界劳动法典: 国际劳工组织的壁橱之幽灵 (Gender, Precarious Work,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Code: The Ghost in the ILO Closet)》. 《不稳定工作、妇女、和新经济: 法律规范的挑战 (Precarious Work, Women, and the New Economy: The Challenge to Legal Norms)》. Eds. Fudge and Owens.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06. 53 - 76.
- Waring, Marilyn. 《如果妇女被考量在内: 一个新女权主义者经济 (If Women Counted: A New Feminist Economics)》. San Francisco: Harper and Row, 1998.
- Watson, Beccah Golubock. 《超越婚姻: 爱与法律 (Beyond Marriage: Love and the Law)》. The Nation 29 January 2007. www.thenation.com/doc/20070212/watson
- Williamson, John H. 《华盛顿对政策改革意味着什么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拉丁美洲调整: 已经发生了什么? (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Ed. John Williamson.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0.
- _____. 《附录。我们的议程与华盛顿共识 (Appendix. Our Agenda and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华盛顿共识之后: 拉丁美洲的重新发展与改革 (After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estarting Growth and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Eds. Pedro-Pablo Kuczynski and John Williamson.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3. 323 - 31.
- Wilson, Ara. 《曼谷的亲密经济: 在全球化城市中的行为似男孩的顽皮姑娘、企业巨头、与雅芳小姐 (The Intimate Economies of Bangkok: Tomboys, Tycoons, and Avon Ladies in the Global C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 Wollstonecraft, Mary. 《女性权利的澄清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iriam Brod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2 [1792].
- 性健康的世界组织 (World Association for Sexual Health). 《新世纪的性健康: 宣言与技术文件 (Sexual Health for the Millennium. A Declaration and Technical Document)》. Minneapolis, MN: World Association for Sexual Health, 2008.
- Young, Claire, and Susan Boyd. 《失去女权主义者的声音? 在加拿大同性伴侣的法律认可之辩论 (Losing the Feminist Voice? Debates on The Legal Recognition of Same Sex Partnerships in Canada)》. 《女权主义法律研究 (Feminist Legal Studies)》14.2 (2006): 213 - 40.

网络作品

- AVERT. 《布什总统为缓解艾滋病的紧急计划 (President Bush'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 January 23, 2008. www.avert.org/pepfar.htm
- _____. 《世界艾滋病统计数据评论 (Worldwide HIV & AIDS Statistics Commentary)》. November 26, 2007. www.avert.org/worldstatinfo.htm
- _____. 《为艾滋病募集资金 (Funding for the HIV and AIDS Epidemic)》. June 26, 2007. www.avert.org/aidsmoney.htm
- Health GAP (Global Access Project). 《言外之意: 关于PEPFAR 预防项目的GAO报告 (Between the Lines: GAO Report on PEPFAR Prevention Programs)》. April 5, 2006. www.healthgap.org/camp/pepfar_docs/HGAPPepfar0406.pdf
- The Henry J.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艾滋病政策情况报告: 美国的妇女与艾滋病 (HIV/AIDS Policy Fact Sheet: Women and HIV/AIDS in the United States)》. July 2007. www.kff.org/hiv/aids/upload/6092-04.pdf
- 《亲密劳工: 关于家庭、保健、与性工作跨学科间的会议 (Intimate Labors: An Interdisciplinary Conference on Domestic, Care and Sex Wor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October 4 - 6, 2007. Organized by Eileen Boris and Rhacel Parreñas. www.ihc.ucsb.edu/intimatelabors
- Khaitan, Tarunabh. 《在印度反女同性恋暴力 (Violence Against Lesbians in India)》. Alternative Law Forum. 12 December 2004. www.altlawforum.org/Resources/lexlib/document.2004-12-21.9555696555/view?searchterm=lesbian
- 《失去控制的女同性恋委员会支持被监禁的女政治犯 (Out of Control Lesbian Committee to Support Women Political Prisoners)》. www.prisonactivist.org/ooc
- RAND. 《艾滋病成本与服务利用研究 (HIV Cost and Services Utilization Study)》. 1999. www.rand.org/health/projects/hcsus
- Reuters. 《雅培制药公司降低艾滋病专利药的价格 (Abbott to Cut AIDS Drug Price Amid Patent Row)》. 10 April 2007. www.reuters.com/article/governmentFilingsNews/idUSN1031946020070410
- SIECUS. 《政策更新 (Policy Update)》. July 2005. www.siecus.org/policy/PUupdates/pdate0192.html
-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门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Affairs). 《特别侧重于与贫穷相关的人口、发展、与艾滋病问题: 简明报告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HIV/AIDS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Poverty: The Concise Report)》. 2005. www.un.org/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concise2005/PopdevHIVAIDS.pdf
-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Fund for Women (UNIFEM)). 《事实与数字: 在非冲突情景下的性暴力 (Facts and Figures: Sexual Violence in Non-Conflict Situations)》. October 2004. www.unifem.org.in/PDF/Statistics%20VAW1-%20Oct'04.doc
- 联合国发展项目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人类发展概念 (The Human Development Concept)》. 2005. <http://hdr.undp.org/en/humandev>
- 美国病毒控制与预防中心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艾滋病—美国, 1981年—2000年 (HIV and AIDS—United States, 1981 - 2000)》. MMWR Weekly 1 June 2001. www.cdc.gov/MMWR/preview/mmwrhtml/mm5021a2.htm#tab1
- 世界银行 (World Bank). 《世界发展指数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6. www.worldbank.org/date
- 世界健康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致力于普及健康: 在健康行业提高艾滋病干预的优先性 (Towards Universal Access: Scaling Up Priority HIV/AIDS Interventions in the Health Sector)》. April 2007. www.世界卫生组织.int/hiv/mediacentre/universal_access_progress_report_en.pdf